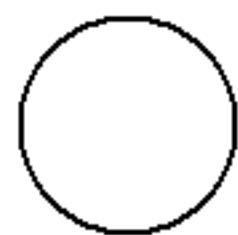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7

一九六一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一年第七期★

目 录

加强国营农场的建设 王 震 (1)

在农村人民公社中

一个人民公社大办粮食的经验 中共醴县委员会调查组 (8)

整风推动了生产 顾建鹏 李兰桂 (12)

心目中时时刻刻要有群众 凌南标 (16)

为农业服务是气象工作的首要任务 饒 兴 (19)

笑里藏刀的“亲善” 郭济洲 (24)

論形式邏輯的对象和作用 王忍之 (28)



加强国营农场的建设

王 震

国营农场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农业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拥有先进的技术装备，现代化机器的大生产基本上代替了手工生产；它具有较高的生产水平，有可能向国家提供高额的农畜产品。在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下，必须进一步加强国营农场的建设，提高国营农场的管理水平，把国营农场办得更好。

毛泽东同志早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为了解决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年年增长的需要同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必须“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①。他还预言：“国营农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有大规模的发展”^②。

建国十一年来，我国的国营农场从无到有，不断地顺利地发展着。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到一九五二年，已经建立了五十二个规模较大的机耕农场，拥有三百三十多万亩土地；一般农事试验性质的地方农场，每县至少有一个至二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间，即到一九五七年，已有七百一十个规模较大的农场（不包括专区和县的农场）；这些农场的耕地面积共达一千五百多万亩，职工五十万人，拖拉机约一万标准台，粮食产量达十一亿九千万斤。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国营农场更有了飞跃的发展。到一九六〇年底，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已经有二千四百九十多处，有职工二百八十八万人，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四点六倍；耕地面积达七千八百多万亩，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四倍；有拖拉机二万八千标准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点七倍以上；粮食总产量达五十余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三点七倍以上。三年来，单位面积的开荒造田的基本建设投资有了很大降低。在各地区的农场中，由于正确地实行了“八字宪法”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出现了一些大面积的或者小面积的各种农作物的高产田。

国营农场在发展的过程中，日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党中央早在一九五一年发给各级党委试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行、一九五三年正式公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就曾经指出，“国营农场应该推广”；国营农场要“一方面用改进农业技术和使用新式农具这种现代化农场的优越性的范例，教育全体农民；另一方面，按照可能的条件，给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技术上的援助和指导”。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又指出，“要求所有的国营农场，团结和帮助周围的农业合作社，在生产技术方面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国营农场的这种示范作用，在它的初办阶段就已经在许多方面初步显示出来。例如，一九五二年，国营机耕农场的小麦平均亩产量为全国平均产量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点七，棉花为全国平均亩产量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八点七，大豆为全国平均亩产量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又如，一九五六年，全国国营农场粮食作物的平均亩产量，比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平均亩产量超过百分之四，棉花产量超过百分之六十六。国营农场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农民优良的傳統耕作法，采用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成就，因此许多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都出现了新纪录。在改良农畜品种、改革耕作制度等方面，国营农场也起了示范作用。当时，很多国营农场还用机器给附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耕、开荒，帮助训练技术干部。

国营农场拥有现代化技术装备，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耕地为例，如一天分两班工作二十小时，大型拖拉机可耕地一百五十亩以上，中型拖拉机可耕地一百亩左右。由

于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高，国营农场的农畜产品的商品率都比较高。把国营农场建设成为提供大量农畜产品的商品基地，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国营农场在开垦大片荒地和建设祖国边疆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开荒是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基本措施之一。我国有大量可以开垦的荒地；这些荒地，大部分分布在边疆、沿海和湖泊附近等地区。开垦这些荒地，可以使亿万年沉睡的荒原变为良田。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大量开荒，必须由国家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并采用现代化的机器。过去十一年来，国营农场在开荒和建设边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新疆地区，已经在天山南北建设起机械化农场一百八十多处。到一九五九年，耕地面积已发展到八百零三万亩。一九六〇年又开荒三百五十七万亩，播种面积比一九五九年扩大将近一倍。在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岛、云南等地的国营农场，也开垦了大量的荒地。这些农场，已经能够生产大量的农畜产品，成为国家的重要的商品基地。国营农场的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工业、交通运输、建筑工程和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发展，迅速地改变着边疆地区的落后面貌。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营农场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军队参加生产，是我军光荣的历史传统。远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人民的军队（当时的八路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克服困难”的号召下，曾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



动，建立了公营经济。在解放战争中，东北解放军后方部队就创办了国营农场。建国以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人民解放军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指示，有一部分军队在边疆实行军垦屯田，为促进国营农场发展和加速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国营农场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我们逐渐认识农场建设的规律性、逐渐掌握多快好省的建设方法的过程。十一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国营农场在建设方面必须贯彻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方针。在大面积生荒地上建立国营农场，必须有一个开荒造田和相应地进行房屋建筑、水利、道路等各项基本建设的过程；而进入垦区的大批人员所需粮食、副食品的供应，国家对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的需要，又要求国营农场尽可能缩短这种建设过程，早日投入生产。因此，在建设开始，如何解决开荒与生产、生产与建设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能否多快好省地发展国营农场的决定性环节。在国营农场创办初期，由于缺乏经验，曾经机械地采取先勘测、规划，再开荒造田、进行各种基本建设，然后再正式投入生产的程序。这样做，在建设阶段得不到生产成果，建场年限长，生产发展慢，耗用国家投资多，达不到党所提出的“投资少，收效快，收益大”的要求。一些地区的经验，特别是有些地区军垦的经验证明，应该改变这种做法，而实行建场安家、开荒生产和

基本建设同时并进，也就是“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建场方针（简称为“五边”方针），并在资金管理方面实行“投资包干”的制度。执行这个方针，是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的。

实践证明，正确贯彻执行“五边”方针，能够使国营农场很快地投入生产，在建场的当年或第二年就能生产出大量的粮食，为继续开垦荒地、扩大基本建设打下必要的物质基础。而通过生产，又可以较快地掌握当地的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特点，有助于因地制宜地全面规划农场的生产和建设。实行“投资包干”的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农场广大干部和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国营农场本身的生产积累来不断扩大建设规模。这样，就能够充分发挥国家投资的效益，达到“投资少，收效快，收益大”的要求。如江西、湖北、湖南、甘肃等省一九五八年以后建立的一批国营农场，由于积极执行了“五边”方针，绝大部分都做到了在建场的当年就有收益，其中不少农场还做到了在建场的当年就获得赢利。从投资效果来看，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三年，平均每年国家投资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国家投资增长约一倍，而开荒面积却增加了五倍多。

贯彻“五边”方针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体现了勤俭办场的原则。“五边”方针要求在建场当中因陋就简，用少量的资金办更多的事，把资金用在生产最需要的地方。这几年来，许多农场贯彻了这个方针，坚持了勤俭办场的原则，促进了生产建设的迅速发展。但也有少



数农场，在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对勤俭办场的原则有些忽视，在基本建设方面追求高标准，非生产性建设占的比重过大。应该指出，勤俭办场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忽视的。离开这个原则，我们就不能达到“投资少，收效快，收益大”的要求。

国营农场在生产经营上必须正确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粮食为纲，农牧业并举，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

国营农场的任务，是向国家提供商品粮食、棉花、肉类以及其他多种农畜产品。为了提供国家建设和出口贸易所需要的产品，国营农场在生产经营方面必须正确地处理农业和牧业的关系、农牧业和其他多种经济的关系。农业和牧业是相互依存、互为发展条件的。以农业为主的农场，只有发展了畜牧业，才能为农业生产提供丰富的肥源，促进农业的发展；以畜牧业为主的农场，只有发展了农业，才能保证发展畜牧业所需要的饲料和职工的口粮，为大量发展畜牧业创造前提。无论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牧业为主的农场，在发展农牧业以外，还应当根据需求和可能发展其他多种经营。农牧业是发展多种经营的基础，而多种经营的发展，可以合理地利用农副产品，充分发挥机械利用率，经济地使用劳动力，增加收入和资金积累，促进农牧业的扩大再生产。在那些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农场，同样也需要适当发展粮食生产和畜牧业，以解决粮食自给和肥源问题。实践证明，只有正确处理这几方面的关系，才能使国营农场的经济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得到顺利的发展。

在国营农场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少数

农场忽视发展多种经营，只种植几种粮食作物，而不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畜牧业、林业、工副业和渔业，结果农场每年生产的大量农副产品，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农田所需要的粪肥极端缺乏，农闲期间劳动力的潜力无从发挥，生产收入不能稳定地增长，甚至有亏损的现象。大跃进以来，国营农场的多种经营有了很大的发展，基本上克服了过去有些农场单一经营的偏向。在全国国营农场经济中，畜牧业和工副业所占的比重，已经由一九五七年分别为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十二左右，提高到一九五九年的分别为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三十二左右。多种经营的发展，进一步巩固和稳定了国营农场的经济，使农场经常有收入，加速了农场的资金周转，增加了自筹资金，为扩大生产规模、加速农场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发展多种经营方面，也有少数国营农场存在重工副业、轻农牧业的偏向，使工业占用的劳动力、资金、物资过多，以致影响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这对于国营农场的建设也是很不利。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农业为基础，以粮食为纲，农牧业并举，在保证农牧业正常发展的条件下，相应地发展那些为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副业和其他生产。在发展的步骤上，根据近年来的经验，在建场初期，因为开荒造田和各项基本建设任务都很繁重，不宜大量兴办工业和其他多种经济，而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农牧业生产。在农牧业生产和各项基本建设有了—定基础以后，再因地制宜地有步骤地发展为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副业等多种经营，这样对生产比较有利。

在国营农场中，必须注意提高机械利用



率，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正确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提高劳动生产率。

国营农场拥有大量的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在技术装备上得到国家优先的大力的支持。现在，国营农场除了已有拖拉机二万八千标准台以外，还有联合收割机三千三百多台，排灌机械十七万五千多匹马力，各种畜牧机械三千八百余台。国营农场已有了一支在政治上久经锻炼的具有企业管理和技术知识的干部队伍，和一支能够操作机械的技术工人队伍。因此，有充分的可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高速度地发展生产。

这几年来，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对机器使用的日臻合理，每标准台拖拉机按标准亩计算的工作量逐年增加。如一九五五年是二千一百五十亩，到一九五七年达到四万亩，到一九五九年达到六千二百多亩。但是，应该看到，目前国营农场在机械设备的利用方面还是不平衡的，还存在着设备不配套，利用的期限较短、停闲的时间较长，维修和保养工作跟不上，折旧费用大，生产成本高等问题，机械设备的潜力还很大。很好地总结过去在这些方面已有的经验，充分挖掘现有机械设备的潜力，以进一步提高田间作业和非田间作业的机械化程度，是提高国营农场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关键。

提高机械利用率的重要一环，是加强机械的管理和维修。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要求有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维修设备。这几年来，许多大的垦区和农场，初步建立了农业机械的修配网和技术人员的培训网，国营农场的机械管理水平和维修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有的农场，由于在机械使用方面

实行了科学管理，相应地建立了机具的修配网点，保证了机车的较高的出勤率。有的生产队，一九六〇年机车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时间利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但是整个说来，国营农场的机械管理水平和维修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机械化生产的要求。有些农场还没有建立对机械的管理和保养制度，有的已经建立了，但未能坚持执行，因而在机车调度使用上存在不少窝工、浪费和损坏现象；有些垦区和农场，修理设备不足，维修所需的配件缺乏；有些农场技术人员不足，技术水平较低，操作不够熟练；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机车的充分利用。有的农场拖拉机的出勤率，只达百分之五十左右。根据这种情况，需要加强对机械的管理，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使用、管理和保养制度，建立和健全机械的修配网和技术力量的培训网。只要这些工作很快地跟上去，就可以使国营农场的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

提高机械利用率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加强机械的综合利用。农业生产是有季节性的，生产的项目又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大量的田间作业，又有大量的非田间作业，既要经营好农(牧)业，又要发展多种经营。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各项作业的机械化程度，降低生产成本，必须使机械能够综合利用，发挥一机多能的作用。许多农场依靠职工群众，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这方面已经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仅拖拉机、播种机、中耕机等机器都能够综合利用，就是过去一直被认为利用率最低的联



合收割机，经过各种技术改造，也扩大了使用范围，收到了综合利用的效果。有的农场综合利用机械的结果，使设备利用率提高一倍到十倍，改变了以前许多机械半年使用半年闲的状况，提高了非田间作业的机械化程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成本。农业机械的综合利用现在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的经验还很不足，对这一工作应该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从当地条件和农业技术要求出发，在不损坏原机器的原则下，认真地进行。

各地农场在正确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方面是有成绩的，许多农场实现了大面积的或小面积的丰产。如一九六〇年新疆有的农场十万亩小麦平均亩产三百多斤；有的农场六百亩玉米平均亩产九百六十斤。但是整个来说，国营农场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还不够高。因此，必须在大面积开荒的同时，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推广试验田、丰产田、丰产队、丰产场等典型经验，由点到面地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可以根据土壤、气候、水利等条件，将耕地分为基本田、一般田和改良田。对于基本田，要采取有力措施，力争高额丰产；对于一般田，要力争高于常年产量；对于改良田，要积极加以改造。总之，要更合理地经济地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力争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单位面积产量指标。

近一两年来，各地在实现高产和改良耕作方法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拿改良耕作方法来说，例如实行轮作换茬、间作套种、分期播种、马铃薯芽栽等，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土壤肥力，增加了产量，又有利于充分地

有节奏地利用劳动力和机器设备。两年来，由于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们增加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各地农场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例如在作物安排上注意节约用种量，适当地多样化，适当地多种杂粮、耐旱耐涝作物、早熟作物，以及使蔬菜提早成熟提早供应，以满足城市工矿区居民的需要等等。这些经验，不仅有助于战胜自然灾害，而且有利于实现农业增产，我们应当进一步加以总结和推广。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达到增产的目的，必须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干部和职工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

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不同地区存在着自然条件的差异。因此，采取任何增产措施，都必须切实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这就要求国营农场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经常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

近两年来，国营农场开展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广大职工的思想觉悟和科学技术知识都有了很大进步。有些单位的职工，由于学习了现代的气象学和现代农业科学，已经初步掌握了有关本地区的气温变化、土壤性质、各种作物的播种日期和生理特性等方面的知识，并且能够把现代科学技术和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的优良栽培方法结合起来。这些都对于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许多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在传播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在各垦区农业技术学校中，正在培养着又红又专的有实际经验和专门知识的农业技术干部和专家。一支既有政治觉悟又



有科学知識的建設队伍正在成长起来。但是，有些国营农場的领导干部，还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識和生产知識，也不尊重农业生产的客观規律，因而在工作中出了一些錯主意，給生产造成了損失。經驗证明，凡是采取了符合作物生长和发育規律的正确的技术措施，就能够丰产；反之，凡是采取了違背作物生长和发育規律的錯誤的技术措施，就一定减产。在科学面前必須老老实实，一点調皮也是不行的。因此，必須認真开展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的运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执行“八字宪法”，正确采用农业技术措施。

在国营农場中，还必須不断地注意健全企业管理制度，充分調动广大基层干部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优越性。

国营农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农业企业，它同国营工厂企业一样，直接按照国家計劃进行生产，实行严格的經濟核算制，在生产上要求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但是，由于它所进行的是农业生产，在管理上應該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不能机械地搬用工厂企业的一套管理制度。参照农村人民公社的經驗，根据国营农場自己的一些經驗，国营农場在管理体制上一般实行总場、分場（或作业区）、生产队三級管理，三級核算，統負盈亏。一般是总場进行全面核算，分場进行基本核算，生产队作为基层生产单位，只进行业务核算，不进行經濟核算。国营农場也在生产队实行“三包”、“四定”的生产責任制度。这样既便于总場实行統一集中的領導，又能够使分場、生产队在組織生产、进行基本建設、财务管理、生活福利事业管理等方面有必要的权力，

充分发挥他們的积极性。許多农場还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結合”的民主管理制度。所有这些，都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几年来国营农場各方面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新建了很多农場，这就在經營管理上带来了一些問題。有些农場的领导干部对业务还不熟悉，管理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健全起来。有些农場管理机构过于龐大，非生产人員过多，不利于降低成本和进行經濟核算。另外，在一部分干部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深入实际、不調查研究、不实事求是、不走群众路綫的不良作風。所有这些問題，都必須根据党的政策，根据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精神，通过整風运动切实加以解决。

現在，党和国家要求国营农場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和畜产品，提供更多的工业原料。为了使国营农場能够担負这个任务，我們必須貫徹执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用全力爭取今年农业丰收，大力办好已經初步建立起来的农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認真执行調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針，把整个国营农場的生产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我們必須将現有的土地經營好，积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同时积极开垦荒地。目前的形势大好，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农場的設備和技术力量也增强了，通过正在进行的整風、整場运动，农場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将不断提高，干部作風将有很大改进。我們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巩固、充实和提高，国营农場的生产潜力必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它在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运动中，会作出更大的貢獻。



一个人民公社大办粮食的经验

中共隴县委员会调查组

陕西省隴县河北人民公社，連續两年获得丰收，成为全县大办粮食的一面红旗。

这个社是在山区。一九五八年，全社十六个生产大队，有八个大队粮食不能自給自足，由国家供应了十八万六千多斤粮食。经过全社干部和群众的两年努力，情况完全改变了。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一千五百三十六万斤，每人平均約一千五百斤。一九六〇年，夏秋作物虽然遭受严重旱灾，粮食生产仍然取得了丰收，全社总产量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斤，每人平均一千一百多斤，除了超额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和留足种子、饲料、口粮外，还储备了余粮。家畜家禽也都有很大增长。社员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一九六〇年每人平均达到一百七十多元。

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切实地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原则，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对于从根本上改变缺粮的状况，起先有些人有畏难情绪，认为“山大沟深，地多劳动力少，粮食不能大增产”。为了解决这个思想问题，公社党委书记李仲义同志深入到白石、业家山等生产大队，总结了連年增产、由穷

队变富队的经验。通过现场会，大家从这活生生的事实中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公社党委还进一步改进了领导方法。一是坚决实行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公社党委书记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这样就带动了生产大队支部书记、队长和生产队长都参加生产。干部参加生产，大大地鼓舞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还能切实地掌握生产情况，加强对生产的领导。二是多和群众商量。例如，一九六〇年天旱，早秋作物减产，为了弥补损失，公社党委书记向白石生产大队的群众请教，根据群众意见，决定大种蕎麦，全社共种了四万五千亩。三是加强调查研究，建立基点。公社党委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经常的工作制度。他们在全公社建立了具有各种不同特点的工作基点，把这些基点当作公社指导生产的参谋部。公社研究生产问题时，经常吸收基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参加，这样就能根据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不同情况，做到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例如，他们经过多点试验，摸出了一套适合山区特点的密植经验，克服了有些同志不顾具体条件强求“一律化”和认为“越密越好”的主观片面观点。



河北人民公社土地辽阔，有阴山、有阳山，有高山、有低凹，适宜种植的作物差别很大。根据这种情况，公社党委决定在发展粮食生产上实行三个并举：扩大耕地面积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举，夏收作物与秋收作物并举，主粮与杂粮并举。这样就便于因地制宜地种植，有利于克服自然灾害，能够更合理地安排农活。实行三个并举的结果，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同时还满足了群众在生活上多种多样的需要。

全社有可耕地二十多万亩，但在一九五八年实际种植面积只有十一万一千多亩。公社党委决定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扩大耕地面积，将可耕地尽可能地利用起来。种植面积能不能扩大？开始也有人怀疑，认为“地多劳动力少，种多了管不好”。公社几个党委委员就分头到各生产大队进行调查，发现各生产大队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的耕地面积很不平衡，耕地最多的白石和兰家堡生产大队，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达五十亩左右，而且经营得好，产量逐年增加。苏家原生产大队，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二十亩，粮食产量很低，全年需要国家供应一万六千多斤粮食。公社总结了白石和兰家堡生产大队的增产经验，号召各生产大队扩大种植面积，并以业家山、侯家寺生产大队为重点，做出了榜样。全社两年来共扩大种植面积五万多亩，扩大的方法是开荒和复种并举。为了充分利用地力，在秋田中套种豆类作物五万多亩，林粮间作二百一十亩。多种就能多收。一九六〇年因为遭灾，粮食的平均亩产量虽比一九五八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但是由

于多种，总产量却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九。

玉米、高粱、糜子是当地的高产作物。一九五八年全社玉米的种植面积只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十点七，而玉米的产量却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五。一九六〇年公社大抓玉米等高产作物，玉米种植面积由一九五六年的一万零七百九十亩，扩大到二万一千四百八十九亩，面积增加了一倍，产量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一百零四万斤。公社在大抓高产作物的同时，还注意了扩大秋田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小麦的种植面积，一九六〇年小麦种植面积达到七万六千九百多亩，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九千九百多亩。所有这些，对迅速提高粮食总产量都起了很大作用。

河北人民公社过去水土流失很严重，耕作粗放，自然灾害频繁，还经常遭受鸟兽危害。公社党委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以下三条带关键性的措施：

一、以水土保持为主，进行土地基本建设。这是发展山区农业生产的一项综合性的根本措施。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公社领导干部在程家原和大队干部、技术人员一道，率领群众突击三天，集中治理了尖山四百多亩，取得了治山的经验。全社在这一冬就修地边地埂和梯田二万多亩。在一九六〇年农闲季节又修起了十一万九千多亩土地的地边地埂；全社百分之六十五的种植面积进行了水土保持；修建了小型水库四个，涝池、水泉、水井、旱井等共一百八十五个，坝堰四千六百一十七条，还修了一些小渠道，扩大了灌溉面积。这些水利建设工程在抗旱中起了重



要的作用。

二、认真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特别注意耕作和施肥两个增产关键。在耕作方面，根据当地的情况，改浅耕为深耕，改迟耕为早耕，改粗耕为细耕，改少耕为多耕。并根据当地轮歇地多的特点，狠抓了早耕和多耕。下年的麦田在夏收前细耕两次，下年的早秋田在秋冬细耕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是经过曝晒、霜冻，促使土壤分化；二是蓄水保墒；三是促进土壤团粒结构，增强地力；四是有利于消灭虫害、杂草。此外，还有利于错开活路。在肥料方面，大力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养猪。全社以积蓄肥为中心，开展了搜、造、漚、烙肥料和种植绿肥的活动。一九六〇年施肥面积占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同时，推行了合理的轮作倒茬。主要是苜蓿和粮食的轮作，每年种一万亩新苜蓿地，开一万亩老苜蓿地，新开的苜蓿地，可以长三至五茬小麦。这样不仅提高了地力，多打了粮食，而且有利于发展畜牧业，做到畜多、肥多、粮多。

三、根据当地自然灾害比较频繁、鸟兽危害比较严重的情况，对作物作了因地制宜的安排。如在易遭春霜的低凹湿地种植玉米，在易遭大风的沟渠种植豆类等低秆和不易落粒的作物。在防雹、防霜冻、防兽害、防病虫害等方面也规定了具体办法和具体制度，逐级都有专人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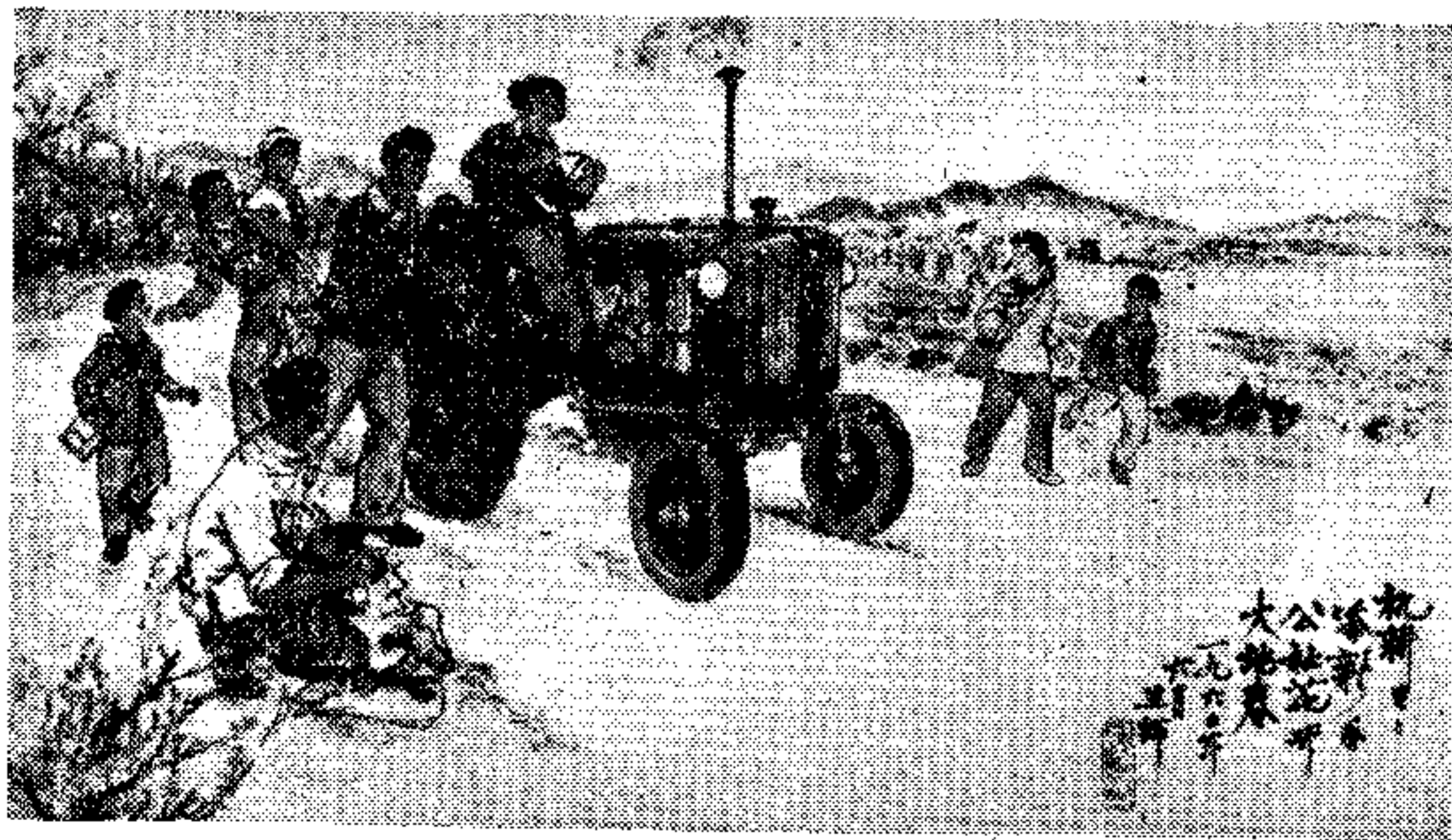
开荒、种地、水土保持等，一切都需要劳动力。劳动力不足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怎么办呢？开始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减少任务，有人主张依靠川原地区的支援。公社

党委就派人深入到耕地多、劳动力少、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农业生产连年丰收的业家山生产大队进行调查，发现这个大队过去大部分农活是在秋收秋播和夏收期间做的，忙闲极为不均。后来，他们调整了作物种植面积，合理安排了活路和劳动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业家山生产大队几年来并没有增加几个劳动力，但是种植面积却一年比一年扩大，而且亩产量在稳定地增长，总产量迅速地提高。根据业家山生产大队的经验，公社在劳动力的安排上，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和以粮为纲的方针，从各方面作了调整，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达到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七，其中直接参加田间生产的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大大地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在活路的安排上，他们根据一年四季各个节气的特点，将农活做了合理的安排：什么时候做什么，何时做完；主要做什么，结合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哪些活路必须在一定的时节做，那些活路可以抽空去做等等。如种小麦，就要求在白露前把山上的地种完，白露后再种平川的地，最迟到寒露要全部种完。在做这些活路时，必须集中力量，其他活路都要让路，保证不违农时。又如搞副业、砍柴、积肥、搞水土保持等，则抽空闲时间进行，必要时搞突击。夏收和早秋作物锄草往往挤在一起，就采取活路提前做的办法，在夏收开始前就把早秋作物锄完，这样就将活路错开了。此外还推广“送货上门”、“修造农具上门”等办法，大大便利了社员，使社员能够集中精力从事生产劳动。



河北人民公社黨委在領導生產中，深深地体会到黨的政策是黨和群眾利益的集中表現，是調動群眾積極性的鑰匙。幾年來，河北人民公社貫徹執行了黨的各項政策，鼓舞了群眾的干劲，克服了各種困難，獲得了丰收。保證黨的政策深入地貫徹執行的關鍵，在於有一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河北人民公社認真地進行了黨的組織建設和選拔、培養幹部的工作。無論在發展黨員或選拔幹部方面，公社黨委都堅持了黨在农村的階級路線。全社生產隊以上的幹部中，貧農、下中農占百分之九十。這些從勞動人民中選拔出來的優秀分子，具有鮮明的階級立場，有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與群眾有密切聯繫。為了提高黨員和幹部的政策思想水平，公社黨委經常組織幹部學習政策，統一認識，提高覺悟，並且定期檢查幹部的工作和思想作風。

幾年來，公社黨委堅持貫徹執行以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重視發展隊有經濟，生產大隊的積累大部分留給生產大隊自己使用，國家每年幫助窮隊發展生產的貸款全部發給窮隊。公社還派了十一名脫產幹部加強對窮隊的領導。全社原有十二個窮隊，現在已經有十一個趕上了富隊。公社黨委堅持實行“四固定”、“三包一獎”、定額管理和評工記分等經營管理制度，同時還正確地處理了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關係。一九五九年糧食大丰收，生產大隊在完成了國家征購任務之後，對超產多的生產隊獎勵了一些糧食。這樣既照顧到國家，又照顧到集體和個人。在一切工作中，公社黨委都堅持政治掛帥，注意使政治教育和物質獎勵結合起來，以充分發揮生產大隊、生產隊幹部和社員的積極性，這樣就保證了農業生產的持續躍進。



春 (新华社稿)

王 师



整風推动了生产

顾建鹏 李兰桂

清溪生产大队是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核算单位。这个生产大队在上級党委的领导下，于去冬今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整風整社运动。在整風整社运动中，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使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和锻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了，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改进了；社員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也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愈加高涨了。走进这个生产大队，可以看到一片预示着今年农业生产丰收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清溪大队共有二百一十六户，九百零八人，男女全半劳动力三百四十七人，一千四百四十九亩水田和八十九亩旱田。这个大队的耕地虽然不多，但是大部分土质较好。一九五八年获得了农业丰收，一九五九年也完成了增产计划。一九六〇年，由于春天遭到了六、七次寒潮的袭击，秋季又遇到了干旱，影响了禾苗的生长，产量比往年减少约三分之一。这自然给人们带来了暂时的困难，但是干部和社員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致，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各种困难，决心在今年争取丰收。整風整社运动为争取丰收创造了更为有

利的条件。

清溪生产大队在整風整社运动中，进一步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广泛深入地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和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的教育，严肃认真地整顿了组织，巩固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坚决地贯彻了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并改进了经营管理制度。今年年初，这个大队就实行了“四固定”的制度。现在全队的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等都已经固定给各生产队使用。实行“四固定”以后，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員的积极性很高，生产队的干部领着社員四处查看了一次，他们对固定在本队的土地、耕畜、农具，人人心中都有了底。并且还讨论了如何经营使用，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这个大队还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办法，总结过去实行“三包一奖”制度的经验，按照实际情况，制定了“三包”方案。“三包”落实以后，各生产队的社員都扎扎实实地挑起了担子。在制定“三包”方案的同时，还健全了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制度，根据当前新的情况，全面地修订了劳动定额。在过去制定的各项农活定额中，有六十四项仍可采用，



有三十一項比較煩瑣的定額被取消，有一百五十五項定額因情況變化進行了修訂。此外還增訂了三十三項農活的定額。在健全定額管理的基礎上，他們認真實行評工記分。現在，這個大隊的十三個生產隊都基本上做到人人有勞動手冊、隊隊有記工簿。大隊還找補了一九六〇年決算分配的款項，全隊共找補四千二百元。一九六〇年的“三包”超產獎勵也兌了現，十一個隊受獎兩千斤谷，二百六十五元。這些實物和現金都及時按勞動工分分配給了社員。

通過整風整社運動，清溪大隊各級幹部的工作作風和領導水平有了新的改進和提高。全大隊共有生產隊以上的幹部二十七人，一般都做到了與社員同勞動、同食堂、同商量。黨支部書記龐碧祥，在檢查各耕工作時，發現小沖灣生產隊因飼草不足，有的牛長得不够好。為了幫助這個生產隊解決飼草問題，他便找儲備了不少牛草、但缺乏燒柴的老屋灣生產隊的幹部商議，按照等價交換、自願兩利的原則，使雙方達成交換柴草和飼草的協議，解決了雙方的困難。

在領導生產中，許多幹部注意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尊重老農的意見。如老屋灣生產隊副隊長周國良很感慨地說：“要事情辦得准，只有找群眾商量。”三月上旬，隊上安排秧田。秧田選擇哪里好？開始時，他打算放在屋門前，認為這樣便于施肥和管理。什麼時候平整？他認為，“百般宜早不宜遲”，主張立即動手。但是，他沒有根據自己的想法作出硬性規定，而是召開社員會，提出自己的

主張，讓大家討論。會上有的青年社員同意，有的社員特別是老農不完全同意。他們提出的理由是：一、屋門前做秧田好處是有，但迎北風，容易爛秧，尤其是对早稻秧威脅大；二、秧田平得太早不大好，去年有的秧田平早了，結果到禾種下泥時，秧田里已長出許多草來。周國良接受了社員的意見，按照大家的決議，除了將部分中稻秧田選在屋門前外（因為中稻下種遲一點，那時寒潮少），早稻秧田則選在背北風的地方，平秧田則等到禾種上水的時候。

清溪大隊的幹部經過整風，更加關心群眾的生活。去年冬天，有十多個社員患病，大隊黨支部為此開了多次會議研究，將病情較重的社員安置到大隊療養組診治，大隊幹部經常前去看望。在春節前後，大隊還給他們送去了一些豬肉、鮮魚、蚕豆、黃豆、糖食等營養品。對生活上特別困難的社員，拿出了部分公益金，進行了補助。劉家灣生產隊隊長劉少周對年老力弱的社員和女社員，在排工中特別注意照顧，盡量給他（她）們安排一些輕活，自己總是撿重活、難活干。由於幹部切實關心群眾生活，更得到社員的擁護和愛戴。幹部和群眾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了。幹部和群眾之間，有說有笑有商量，親如一家。社員們對幹部也很關心，經常囑咐幹部注意休息，別把身體累壞了。

經過整風整社運動，社員的勞動積極性有了新的高漲。社員的出勤率高，工效高，質量好。今年一月份以來，很多社員超過了勞動定額。貧農李揚生家里四口人，自己和



爱人都参加劳动。自今年一月到三月中旬，他一个人就已经做了六百二十多分工，超过了定额。六十六岁的下中农李惠连，是队上的看水员，每天一边看水，一边为队里扯猪草，还经常督促儿子、媳妇好好劳动。不仅贫农、下中农进一步发挥了劳动积极性，就是部分比较富裕的、过去劳动不够主动的上中农，现在也表现出相当高的劳动积极性。许多社员为了提高劳动工效，在劳动中发挥了创造性。贫农周梅生是老屋湾生产队的肥料员。他已经六十多岁，但身体还很健壮。自从实行家肥按质论价、现金收买的政策以后，社员们经常请他上门去收家肥，他比往日更加忙碌了。为了更多更快地收好家肥，他改进了收肥办法，提高了收肥效率，自今年二月份以来，已经收集了一百九十多担人粪尿。

社员对于发展生产的要求十分迫切。在春耕大忙时节即将到来之前，大家都忙着添置农具和栽种树木。全队有二百多户社员共添置了各种小农具约六百三十多件。社员李文吉一下就添置了七件，锄头、耙头、筲箕都是双套。各生产队和社员纷纷提出在山里栽竹子、杂木、棕树、果树，在塘里养鱼，在坝里栽藕，把田埂加宽种豆子。目前，全大队已种植各种树苗四万多株，栽桃、梨、桔、枇杷、桂花等果木一千五百多株。老屋湾生产队对归本队使用的山林进行了全面规划。他们原来计划种植十七种树，共二千六百多株。经过社员努力，已超额完成任务，共植树二十一种，三千四百多株。在集体造

林任务完成以后，社员又买了些桃树、枇杷等果树苗，栽植在屋前屋后的空坪隙地或自留地里。各个生产队积极挖掘生产潜力，寻找生产门路。神山塘生产队社员充分利用土地增产粮食作物，把地边、洲地种上高粱、饭豆和绿豆。他们又利用生产空隙，在公路旁和山上开了三、四亩荒地，种上了红薯和花生。花园里生产队的社员们还冒雨下田，加宽田埂，准备种豆子。

社员的积极性，不仅表现在劳动和发展生产上，还表现在进一步增强了集体观念和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的责任感。例如老屋湾生产队的社员在讨论生产计划时，先后反复讨论了七次。干部根据群众的意见，研究、修改，再研究、再修改，终于制定出一个积极可靠、大家满意的生产计划。社员们在讨论生产计划时，对于种植多少双季稻曾展开了一场争论。有人主张多种，有人主张少种。最后通过对本队的水利、土质、劳力等条件的详细研究，才确定了双季稻的种植面积。社员对技术措施，也讨论得非常仔细。例如关于每亩田施多少肥，哪些田施什么肥，采用什么品种，怎样做到不违农时，以及保证耕作质量等等问题，都曾反复地进行讨论。

清溪生产大队社员们生产热情的高涨，是和他们对今年农业增产具有充分信心分不开的。这里社员们普遍反映：照这样干下去，今年生产有五条保证：一是保证完成种植计划，二是保证不误季节，三是保证耕作质量，四是保证积极出工，五是保证队队超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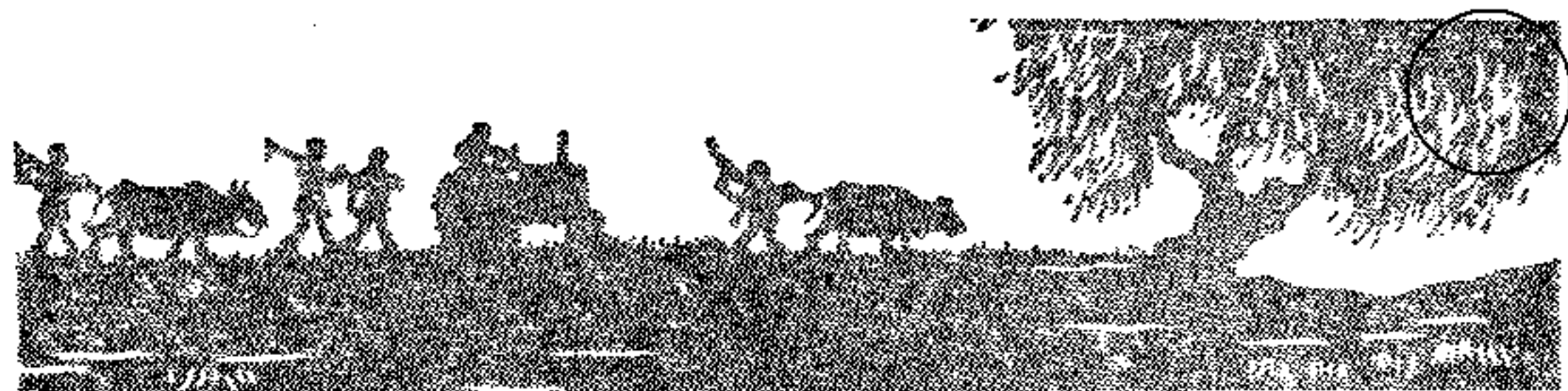
从清溪生产大队当前的生产情况看，来势很好。走进这个大队，只见满壠金黄色的油菜花和青蓝色的蚕豆花，蚕豆大部分正在结荚，小麦已开始含苞。春雨过后的田野里，流水潺潺作响。圆形的肥田分布在田间。白水田大都犁了两次，耙了两次。有的生产队已经开始浸谷种，人们在忙着播种的准备工作。

为了把握住整风整社后的大好形势，搞好今年的生产，力争获得好收成，大队党支部正在更深入细致地做好以下几件工作：

一、积极采取措施，保证生产计划的实现。全队在二月份通过上下结合的办法，充分发扬民主，制定了生产计划。这一生产计划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精神，对粮食生产、林业、牧业、副业、渔业都做了全盘的安排。为了保证这个计划逐步实现，入春以来，大队在全面做好备耕工作的同时，开展了突击积肥运动，一手抓收集家肥，一手抓大积土肥。今年的肥料比往年积得多，质量也好。同时，还抓紧春收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他们还规定要定期检查计划完成情况，根据计划作出短期排工。

二、搞好生活，积极办好公共食堂。清溪大队的干部认识到搞好社员生活是保证搞好生产的重要关键，因而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办好食堂的工作上。经过干部和社员的努力，现在全生产大队的十八个食堂都日益巩固，越办越好，社员吃得饱、吃得好。为了使食堂办得更好，大队结合整风整社运动对食堂又进行了一次整顿，派了一批党团员骨干加强食堂的领导力量，每个食堂都建立了以贫农和下中农积极分子为骨干的领导核心。大队还切实帮助各个食堂建立好家务，种蔬菜和养猪。

三、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清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在工作中很注意对社员进行思想教育。党支部五个委员，分工领导各生产队，实行了“三包”（包政治思想工作、包生产、包生活）。去冬今春以来，大队党支部反复地向社员进行了思想教育，讲形势，讲政策，帮助干部和社员认清生产的有利条件，鼓舞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在各生产队之间，还组织了评比竞赛，进一步鼓舞了社员的劳动热情，推动了当前的生产。



心目中时时刻刻要有群众

凌南标

我是上海市南汇县惠南人民公社惠东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我脑子里总转着一个问题：工作做不好，常常同我们的工作作风有密切关系，可是，改进工作作风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通过总结一九六〇年的工作，我想通了这个问题。说来也是老生常谈了，这就是：心目中时时刻刻要有群众。

我们办的是什么事？办的是群众的事。这些事要依靠谁去干？要依靠群众去干。办群众的事，当然要懂得群众想办什么事，不想办什么事；要靠群众去干，当然要群众乐意去干；才干得好。要做到这两点，就不能不放下架子同群众打成一片，同他们商谈，积极领导他们

去办。党教育每个干部要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是做到这两点的一把钥匙。

人民公社化以来，一个生产队，既要管群众的生产，又要管群众的生活。在生产中，有农林牧副渔等各个方面；在生活中，也有办食堂、办托儿所、办业余教育以及办卫生事业等等工作。要管好生产和生活，离不开做

人的工作，因此，又要抓对群众的思想教育。真是千头万绪。如何领导好一个生产队，看来可不容易。可是，仔细想一想，这也不难。第一，我们办的这些事，都是对群众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群众是会愿意办的；第二，群众人多力量大，一齐动员起来，大家来办，这些事情也是一定能办得好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生产队的第一小队，有一片九十多亩的土地，地势低洼，里面小沟多，茅柴多，地块零散，高低不平。这片田因为年年歉收，群众给它取名叫“死田”，还编了一首歌谣道：“小芦荡，一片荒，茅柴塞胸膛，刺碎裤子裆。”群众早就有着把这“死田”变成“活田”的愿望。一九五九年冬天，社员们提出了“要千年死田翻身”的口号。党支部根据群众要求，积极领导他们大战了十五天，终于铲平了泥丘，填平了水沟，并耕翻了十多亩长满茅柴的荒地，把原来分成七十八块高低不平的田，联成一大片，种上了油菜。经过社员的精耕细作，这些油菜长得十分好，平均单产比全队大面积平均产量还高出百分之三。油菜收获以后，为了防止旱涝灾害，社员们又在这片地里修了渠道，接着种上了单季老来青晚稻。秋收时，这片晚稻单产比全队大面积土地的单产又高出百分之七。于是，这块“死田”便被群众称为“黄金盆”了。把“死田”变“活田”，把“小芦荡”变成“黄金盆”，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件简单的事。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要做多少复杂的工作，这件事才能办成。但是，这件事对群众大大有利，他们乐意去办；他们乐意办，劲头就足了，主意也多了；大家一动手，请看，不就办成了吗？



說是不難，可也不容易。這不容易處，就在於要真正懂得群眾的心思，真正相信群眾，真正做到同群眾心連心。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認真地實行“四同”。也舉幾件事來說一說：

一個生產隊的主要任務是搞好生產，只有生產搞好了，社會主義建設才能順利發展，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斷改善。這當然是對群眾有利的大好事情，群眾當然是樂意搞好生產的。但是，在沒有認真實行“四同”以前，幹部遠遠一看，群眾在田頭干，以為就沒有問題了。後來生產隊幹部認真實行了“四同”，在一個小隊里同群眾一面勞動一面談心，才了解到情況並不是這樣。原來這個小隊六個多月沒有很好地抓評工記分工作，工分雖然上了賬，但工分定額定得不合理，記分也沒有經過群眾評議，有不够公平的地方，群眾有很多意見，雖在田頭干，勁頭却使不足。經過生產隊黨支部反復討論，把黨的按勞分配政策直接交給群眾，依靠群眾自己來做好評工記分的工作，群眾的主意可多啦！他們創造了一整套的評工記分的辦法，如：生產隊在布置一段生產任務時，事先要經過試工並和有代表性的人一起研究，制定工分定額，由小隊結合具體情況參照執行；根據農活特點，分別推行大包小評和按件記工等辦法；由記工員每天把工分二聯單送交會計，登入社員勞動手冊，一句一公布，一月一小結；幹部和社員一起評工記分，不能有絲毫特殊。這一套辦法，都是群眾提出來經過生產隊黨支部討論後才訂下來的。實行了這套辦法，工效就立即大大提高了。可見，不同群眾一起勞動、一起談心，就不能懂得群眾的心思，發覺不到在貫徹執行按勞分配政策上有什么問

題，也就不能認真地去抓評工記分的工作；不相信群眾，不把政策交給群眾討論，就提不出這一整套切實具體的評工記分的辦法；不堅決貫徹黨的按勞分配政策，不把評工記分工作做好，群眾的生產勁頭就鼓不足。

一個生產隊，除了領導好生產而外，還必須安排好群眾的生活。我們愈關心群眾的生活，群眾的干劲就愈大。這話說來容易，可是，怎麼才能安排好群眾的生活呢？拿吃飯問題來說，不同群眾一起在食堂吃飯，吃一樣的菜、吃一樣的飯，就不曉得群眾覺得哪些好吃、哪些不好吃，就不懂得食堂那點辦得好，那點辦得不好。我們同群眾在一起吃飯，群眾對食堂的意見，我們隨時都能聽到；該怎樣办好食堂，也可隨時同群眾商量，办好食堂的辦法就找出來了。去年三秋以前，有些食堂由於蔬菜沒有種好，加上某些炊事員和管理員有嚴重的自私行為，辦得不好，引起群眾的不滿，這些情況，是我們在同群眾一起吃飯以後才發覺到的。幸而發現得早，我們在縣委的領導下發動群眾進行大鳴大放、大整大改，調整了食堂工作人員，加強了食堂管理委員會的工作，還建立了各種制度。食堂面貌為之一新，社員普遍滿意。群眾說：“食堂辦得好，我們心定了，大家可以一心一意搞生產。”像吃飯這樣的大問題，我們為什麼也會一時疏忽了呢？一句話，是群眾觀點薄弱的表現。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①通過這一件事情，我們進



一步懂得了,要“四同”,就要和群众同心同德,把整个身心交给群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群众的知心人,才能够为群众办好事情。

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灵魂,领导一个生产队,如果脱离了政治思想工作,什么工作也做不好。政治思想工作到底应如何做法,这也是我们过去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向群众进行教育,最大的困难就是摸不到群众的心。群众在想些什么,要求些什么,我们不了解。不管什么事,都依靠开会解决,开起会来,又是干部谈的多,群众谈的少,听进去的也少,结果浪费了时间反而弄得群众疲劳,影响生产。干部实行“四同”后,这种情况根本改变了。在“同”的过程中,干部不论在田间,在食堂,在路上,在社员家里,都可以听到很多群众的议论。议论内容十分丰富,从思想问题到实际问题,从生产问题到生活细节问题,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我们绝不能看轻群众的这些议论,它是我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资本”。用去年三秋中的例子来说,我们在跟群众同劳动时,听到二小队个别社员反映,他们对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三秋任务缺乏信心。再一了解,发现小队干部本身也普遍存在着畏难情绪。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极大的思想问题。支部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首先从解决思想问题着手,发动群众总结了夏收夏种工作的经验,分析了虽然当时任务重,时间紧,人力少,但是还有不少有利条件。于是干部和群众心里开了窍,树立了雄心壮志,三秋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政治思想工作并不能到此为止,还必须步步深入地去,特别要到实际斗争中去做。实行“四同”,为我们更深入地做思想工作创造了条件。当三秋工作热烈地开展起来时,生产队副队长朱水全在五小队和社员一起种麦,听到了社员对工人家属王银英不参加劳动有意见。他第二天就去访问这个工人家属,从谈心中了解到这个妇女虽然有依赖丈夫、轻视农业劳动的思想,但她也有一些具体困难。家中有四个小孩,小的还得喂奶,出去参加劳动,家中孩子没有人照管。朱水全同志一方面对她进行了劳动光荣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十分同情她切身的困难,帮助她把小孩送到托儿所里去。这个女社员由于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又为干部体贴入微的关怀所感动,积极地参加了劳动,后来还被推选为生产小组长。群众看到干部这样关心群众,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正由于我们实行了“四同”,深入地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结果是,不必要的会议减少了,群众思想问题及时解决了,干部和群众的心齐了,生产也就搞得更有起色了。

话又说回来了,实行“四同”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心目中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群众,那末身子虽然和群众“同”在一起,心却不和群众“同”在一起,“四同”就会变成形式。所以,我想来想去,归根到底一句话,还是心目中时时刻刻要有群众。

(原载《解放》杂志1961年第2期,
本刊转载时文字上略有修改)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1—132页。



为农业服务是气象工作的首要任务

· 饒 兴 ·

气象工作是农业生产的尖兵，是我们向自然作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现在，全党全民正在积极响应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号召，千方百计地争取今年农业丰收。全体气象工作者应当竭尽全力，踏踏实实地做好气象服务工作，使农业生产能够充分利用有利的气象条件，防御和克服不利的气象条件的影响，争取获得好收成。

建国十多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实践证明，气象工作把为农业服务做为重点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农业生产和气象条件的关系特别密切。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光、热、水分和养分是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必要条件，而其中光、热和水分都是气象因子。没有充分的阳光和热量，农作物就难以进行光合作用，很难生长发育；而没有水分，农作物就根本不能成活。农民说得好：“土是根、热是劲、水是命”。农作物生长在田野里，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不仅怕大风、暴雨、霜冻、干旱等自然灾害，而且在生长发育各个不同的时期，对气象条件又有不同的要求。以水稻为例，在播种、移栽、分蘖、拔节、抽穗、扬花、成熟等各个生长发育期，对气象条件的要求是各不相同的。

在播种和秧苗期间，一般要求日平均气温十至十二度（摄氏）、水温稳定在十二度以上，播种后有三到五个以上的晴天，这样就出苗快、长得壮。如果在此期间日平均气温在十度以下，或短时间内气温急剧下降，最低气温降至五度以下，并连续阴雨四天以上，就可能发生烂秧现象。在抽穗扬花期间，要求天气晴朗，有微风，日平均气温在二十度以上，相对湿度在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左右。如果在此期间遇到日平均气温低于二十度和连日阴雨，就对扬花授粉不利，容易形成空壳秕粒和感染稻瘟病。早稻播种时正处于天气多变的早春，这时温度很不稳定，特别是在南方，伴随着低温而来的常有连绵的阴雨。如果播种过早，就会遇到低温阴雨的袭击，造成烂秧；如果播种过晚，不但延迟早稻的成熟期，还会影响晚稻的移栽和生长，往往造成空壳秕粒，减低产量。农作物种类繁多，特性各异，对光、热、水分和养分的要求不同，这种要求又随着气候、地形、土壤、品种以及各种农业技术措施和耕作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且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情况（如纬度、地形、高度等）不同，气候状况又有各自的特点。各地的不同气候条件，有时



对某种作物生长有利，而对某种作物生长不利。同一种气候条件，在这一阶段对这种作物或农事活动有利，在另一阶段却对它不利。

要使农业生产得到丰收，必须切实地研究和掌握各种农作物在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要什么天气、怕什么天气”的规律，真正做到从不同地区、不同气候、不同作物、不同品种以及耕作措施等实际情况出发，瞻前顾后，全面安排农事活动，以便不违农时，充分发挥天时地利的作用。而要准确地掌握和利用农时，还必须考虑到天气的突然变化，如大风、暴雨、干旱、霜冻和冰雹等灾害的袭击，并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农业技术措施。“看天、看地、看庄稼”，灵活地掌握具体情况，摸清天气变化的规律和农作物生长发育的特点，是向自然作斗争，争取农业生产丰收的重要一着。

气象工作在贯彻执行把为农业服务做为重点的方针的过程中，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以来，全国已经基本建成了一个星罗棋布的气象服务网，配备了大量的仪器，培养了大批的气象技术干部。在气象科学技术方面，天气预报方法有了新的发展，预报准确率和预报时效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农业气象预报、海洋水文气象预报等专业气象预报也已开始建立。以人工降雨为中心的人工控制局部天气的试验研究工作已经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所有这些，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我国气象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同連續两年特大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气象事业起到了参谋和助手的作用。例如一九六〇年山西省翼城县遇到了二百余天的大旱，以及大风、霜冻等自然灾害，该县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充分运用了气象工作这个武器。早在三月间，县委就根据县气象站的天气干旱预报和各公社气象哨查墒的结果，摸清了“敌情”，反复教育广大群众树立长期抗旱的思想，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旱高潮。全县扩大浇地面积六万五千多亩，保证了玉米、棉花等春播作物的适时播种。四月间，根据天气预报，得知将有一场严重的终霜冻，领导上便动员群众进行防霜护苗工作。仅该县大交公社，就有三万余亩麦田安全渡过终霜冻。县委还根据四月上旬将有小雨的天气预报，发动群众在雨前为八万九千多亩麦田追了肥，充分发挥了肥料的效益。这样，全县经过顽强斗争，终于战胜了特大的自然灾害，夺得了丰收。

在贯彻执行把为农业服务做为重点的方针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地体会到，天气预报是气象工作的中心，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重要手段。

天气虽然变化多端，非常复杂，但仍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这些规律是可以逐步被认识和掌握的。而天气预报就是力求准确地反映天气演变的客观规律。天气演变受着许多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即使在同一天气系统控制下，由于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植被等差别，天气变化也会有所差异。要准确地反映天气演变的客观规律，必须运用唯物辩



证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天气演变的过程,把大范围天气变化的一般规律和局部天气变化的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观察全局情况,又注意地区的特殊变化。这样才能不断地认识和揭示天气演变的各种规律,作出比较准确的天气预报。

关于天气预报的技术方法,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我国是采用天气图预报方法,即由气象台的预报员根据分布在一定范围内的地面和高空气象站的定时观测记录,分析绘制地面和高空各层的天气图,然后再根据按照观测记录的时间先后而绘制成的天气图和有关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天气系统的发生、发展和移动以及因之而产生的天气现象,作出大范围的天气预报。这种预报方法只能粗略地揭示大型和中型偏大的天气系统的变化、地形地理影响和大范围内一般的天气变化趋势,很难预报出各个地方特有的小范围天气表现。这样就使它在为生产、特别是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面,有了一定的局限性。

大跃进以来,我们对天气预报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初步找到了一套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天气预报方法。这一套技术原则和方法概括起来就是:“天气预报大中小结合,以小为主”。所谓“大”,就是指中央和各省气象台利用天气图和各类气候图表,划分天气模式,制订天气卡片,探求大型大气运动的客观规律和天气演变过程,从而作出大范围的天气预报。“中”就是指专区气象台根据省以上气象台的天气分析,并利用专区小天气图、历史资料和群众

经验,预测出大型大气运动在本地区的地形影响下所发生的部分改变,作出专区范围内的比较具体的分片天气预报。“小”就是指补充预报。它是县气象站和人民公社气象哨,从当地地形、气候条件 and 生产需要等具体情况出发,在收听专区台或县站天气预报的基础上,仔细观察本地区各种气象要素的演变,以及天象和物象对天气的反映,并征求老农的意见,进行补充订正,作出本地区的天气预报。经过这样大中小相结合作出来的天气预报,就准确得多了。特别是县气象站和人民公社气象哨比较了解当地的农业生产和地形地理特点,不仅预报准确率较高,同时还能密切结合生产的需要,所以在使用天气预报时应以小为主。

在编制天气预报时,各级台站既要密切配合,彼此尊重,上下会商,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独立思考。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专业气象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智慧,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和气象科学技术水平。

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探索和寻求反映天气演变客观规律的征兆。这种征兆大量地反映在天气图、历史资料和群众经验之中。经过仔细的调查、整理、统计、分析和验证,就可以逐步摸清天气演变的客观规律。反映天气演变规律的资料,我们通称为天气预报指标。从无数次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在天气预报的技术方面,指标愈细致、愈精确,客观依据就愈充分,预报准确率也



就愈高。

为适应生产需要，天气预报在时间上必须长、中、短期相结合。长期是半月以上，中期是三至十五天，短期是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时。天气预报长、中、短期相结合，就便于农业生产部门长计划，短安排，争取主动。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能完全准确无误地掌握住天气变化的规律。因此，天气预报必须以中期补充订正长期，以短期补充订正中期。长期供战略参考，中期供战役部署，短期供战斗使用。三道防线，而以中期为重点。长、中、短期的天气预报要有机联系，相互策应，协同作战。使用天气预报时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认真进行分析判断。要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着想，做好充分准备，宁可备而不用，力戒侥幸心理。这样，我们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完全处于主动地位。

为了使气象工作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其他部门服务，必须使气象工作逐步走向专业化。国民经济各部门对气象工作的要求各有不同，仅凭一般的天气预报是不能满足各部门生产需要的。天气预报只是预告未来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并未说明这种天气变化对生产特别是对主要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将带来什么影响。因此，必须在以为农业服务为重点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行业对气象条件的具体要求，有的放矢，进行专业气象预报（如农业、民航、渔业捕捞等），使气象工作紧密结合生产需要。

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农业技术的

不断改进，农业对气象条件的要求愈来愈严格。各种农作物品种和特性不同，对气象条件的要求也各有不同。因此，必须把天气预报和当地农作物生长发育中“要什么天气和怕什么天气”的特点结合起来，精确地编制好农业气象预报，以便为农业生产部门提供资料，充分利用有利的天气和气候条件，防御不利的天气和气候条件的影响，使农业生产获得丰收。

编制农业气象预报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它必须从当地的生产需要、耕作方法和经验，以及当地天气和气候特点等具体情况出发，才能适应各种农作物错综复杂的要求，做到因时、因地、因作物制宜。因此，以县气象站为单位来编制农业气象预报，并经过人民公社气象哨，生产大队气象组补充订正，才能基本上接近于实际。

编制农业气象预报，首先要知道农作物对气象条件的要求（气象部门通称为农作物气象指标）。这种气象指标，一般是根据对长年农业气象观测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分析得出来的。而我国这种资料年限短、残缺不全。如果等待长期观测，得出指标，再作农业气象预报，就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我国农民有数千年从事农业生产和同天灾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如能广泛收集，进行总结，并和气象历史资料对照，结合实况观测进行验证，就可得出农作物气象指标。有了指标，再根据中长期天气预报，进行综合分析，便可作出农业气象预报。为使农业气象预报更加切合实际，作出农业气象预报后，还要发



到气象哨、组，根据各公社、生产大队的生产和气候的具体特点，进行补充订正，并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实地观测，再具体运用。利用这种方法编制的农业气象预报，在气象部门通常简称为“四结合、过两关”（四结合是天气预报、气候资料、群众经验、实况观测相结合，两关是哨组补充订正和实地观测使用）。实践证明，在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下，这是一种编制农业气象预报的多快好省的方法。

近几年来，全国建立了“专区有台、县县有站、社社有哨、队队有组”的气象服务网。这个服务网是气象事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标志，是广泛开展气象服务工作，迅速发展气象科学的很好的组织形式。气象台站和气象哨组在业务上是紧密联系的，在性质上是各不相同的。气象台站是骨干力量，其仪器设备和观测方法必须力求正规统一；气象哨组则是社队按“自愿、自建、自管、自用”的原则建立的，是气象工作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第一线，人员以兼职为宜，其仪器设备，则根据生产需要和当前可能的条件办事，因陋就简，不要求统一。有了这样一个台站和哨组紧密结合的气象服务网，就有可能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需要，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进一步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由于建立了台站和哨组紧密结合的气象服务网，使广大劳动群众参加到气象事业中来，大大地提高了天气预报的质量，使天气预报和生产更加紧密的结合，改变了我国气

象事业的面貌。群众是生产的实践者，有着十分丰富的生产经验。远在三千年前的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现在分析起来，东南方来的雨多为绵雨，西北方来的雨多为阵雨，它对庄稼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秦汉时代，我们的祖先又总结了黄河中游一带的一年内季节变动的规律，创造性地订出了二十四个节气，以后这二十四个节气逐渐成为各地进行农事活动的日程表。流传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看天经验和天气谚语，世代相传，经过反复的验证，绝大部分是反映着当地天气变化的客观规律的。不难看出，如果没有大量的气象哨组和广大群众参加，仅依靠国家台站的专业气象人员，气象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这进一步说明了科学来源于实践，人民群众具有伟大创造力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总结气象工作已经获得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一九六一年的气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兵力，进一步做好为农业服务的工作。在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重点必须放在提高天气预报和农业气象预报的质量上，并且围绕这个中心，提高气象观测资料质量，加强农业气象的试验研究，推广新的预报方法。同时，还要结合生产需要，积极进行以人工降雨为中心的人工控制局部天气的试验研究工作。



笑里藏刀的“亲善”

· 郭济洲 ·

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非洲。新上台的肯尼迪政府，为了推行对非洲的侵略政策，采取各种狡猾手段，做出种种“亲善”姿态，如派遣“和平队”去非洲从事搜集情报和文化侵略活动，扩大非洲留美学生的名额，“殷勤招待”非洲的访问者，建议每一个美国城市同一个非洲城市建立“密切关系”等等。不久以前，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斯对非洲十多个国家的访问，就是肯尼迪政府在这方面活动的一个重要步骤。威廉斯在访问中，一方面搞情报，为美国侵略非洲筹策，一方面进行欺骗和拉拢，装作是非洲人民的“朋友”，虚伪地宣称肯尼迪政府“特别关心和同情非洲人民的愿望”，将“帮助”非洲人民“实现自决”，“支持‘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政策”，等等。

非洲拥有极其富饶的矿藏和农业资源，尤其是钻石、石油、黄金和钴、铀、锂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稀有金属。美国的垄断资本家向非洲输出资本，通过剥削廉价劳动力和采取半奴隶式的强迫劳动，比在国内投资可以获得加倍的以至好几倍的利润。不仅如此，用肯尼迪的谋士们的话来说，美国在非

洲还有着“地理政治上的利益”，“非洲对西方的防务是重要的，因为它守卫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南翼。”加紧侵略非洲，是美帝国主义实现它的所谓“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非洲原来是被欧洲殖民主义者瓜分了的地区。老殖民主义者长期以来的残酷统治，激起了非洲人民的不断反抗。近几年来，非洲人民日益觉醒，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支援不断加强。在这种条件下，美帝国主义要加紧侵略非洲，就不得不采取比较迂回的策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自己伪装起来。

刚果局势的发展，充分说明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手法的阴险狡诈，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剥开了这个假仁假义的新殖民主义者的画皮。

盗用联合国的旗帜来进行侵略，是美帝国主义在非洲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法。肯尼迪在上台前就说过：“美国必须使联合国成为美国在非洲进行努力的中心工具”。美帝国主义对刚果实行武装干涉，就是通过所谓



“联合国军”来进行的。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军”所到之处，原来由刚果政府军所守卫的阵地、机场和港口被占领，刚果爱国军民遭到攻击和屠杀，刚果各个叛乱集团的分裂活动得到支持，刚果合法政府的领导人受到种种迫害。在“联合国军”的庇护下，被刚果人民赶走的大批比利时殖民者又重新回到刚果，据《华尔街日报》供认：这些人“再次控制了大企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刚果很多服务部门”；“比利时顾问正重新担任政府职务”，“回来接管现在由联合国人员担任的工作”。美帝国主义勾结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扶植和收买了刚果民族败类卡萨武布、蒙博托、冲伯、卡隆吉之流，策动他们进行叛乱，千方百计地要颠覆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卢蒙巴—基赞加合法政府，并且终于杀害了卢蒙巴和这个政府的另外一些领导人。在卢蒙巴等被杀害后，美帝国主义不顾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愤怒抗议，公然表示要继续通过联合国镇压刚果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卡萨武布等叛乱集团反对刚果合法政府。肯尼迪悍然声明：“美国一向支持并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刚果的活动”，“美国认为唯一有权代表整个刚果讲话的合法的当局”是卡萨武布“领导下建立的政府”。据美联社报道，这次威廉斯到刚果进行阴谋活动时，曾同卡萨武布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会谈，威廉斯代表美国政府“保证继续支持”卡萨武布叛乱集团反对刚果合法政府。在同卡萨武布叛乱集团的“副总理”博利康果会谈

时，威廉斯再次强调美国承认这个叛乱集团为“刚果的政府”，要同这个叛乱集团“维持十分亲密的合作”。最近，在美、比等帝国主义的策划下，刚果各个叛乱集团举行了所谓“圆桌会议”，“决定”把刚果变成一个由若干所谓“独立国家”组成的“邦联”，以代替统一的刚果共和国，“邦联总统”则指定由叛乱分子卡萨武布担任。

美帝国主义所谓“支持”民族独立运动，所谓“支持‘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还不清楚么？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卡萨武布、冲伯等叛乱集团所盘踞的地区，早就已经挂上了“独立国家”的招牌，卡萨武布、冲伯等这一小撮非洲败类，早就已经自封为“总统”、“总理”等等，然而在那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不但丝毫没有触动，而且还在继续加强，而真正维护国家主权的合法政府的权力却被剥夺，政府领导人遭到监禁和杀害。美帝国主义所要“支持”的，正是这样的“独立”。在美帝国主义者的心目中，“非洲人的非洲”一词中的“非洲人”，就是卡萨武布、冲伯这样的非洲败类。美国现任副国务卿鲍尔斯在几年前就说过：“为了渗入非洲，必须利用黑人。”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通过扶植傀儡政权，充当自己的代理人，不但可以达到向非洲扩张的目的，而且还可以使自己避免成为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打击目标。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声明，深刻地揭露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这种推



行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声明指出：“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拼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帝国主义者力图割裂和破坏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主权，歪曲民族自决的含义，在所谓‘互相依赖’的旗帜下，强制推行殖民主义统治的新形式，在这些国家中扶植自己的傀儡执政，收买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利用民族纠纷这个恶毒的武器来削弱这些年轻的尚未巩固的国家的力量。”

肯尼迪政府标榜所谓“支持‘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政策”，还意味着要排挤老殖民主义者的势力，使非洲最终变成美帝国主义的非洲。还在一九五九年十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对非洲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就认为，美国要像过去那样，“依靠欧洲友好国家的继续控制非洲，来作非洲的稳定性以及和我们（美国）进行可靠合作的保证”，已经不行了。报告要求美国政府对非洲的侵略活动能“跟得上当代非洲的变化速度”。据外国通讯社不久以前报道，肯尼迪任命的非洲问题特别小组所提出的报告，也认为美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主要通过以前一直在统治着非洲大陆主要部分的西方国家来处理非洲问题”，而应当“直接同非洲各国接近”；报道说，肯尼迪采纳了这个建议，“为了这样做，即使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部分国家发生摩擦，也是迫不得已的。”威廉斯在非洲的活动，就是执行

肯尼迪政府排挤老殖民主义势力、“直接同非洲各国接近”的政策。这就难怪乎威廉斯一說出“支持‘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政策”，就立即引起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强烈反感。尽管威廉斯一再表白他所說的“非洲人”包括在非洲的殖民者，但仍免不了遭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攻击。英国保守党报纸《约克郡邮报》罵威廉斯“不仅是一个相当愚蠢、不懂得外交的外交家，而且还是那些爱嚷嚷的许多美国人的非正式代表，这些人一方面赞扬美国牌的金圆殖民主义，同时却对我们的殖民主义一直加以攻击。”法尼亚首府内罗毕的商会主席则讽刺威廉斯說：“如果我们的美国朋友会知趣地呆在家里解决自己有关黑人的问题，而让我们用多少是愚蠢的英国方式解决我们在这里的问题，他们就好比跑到这里胡说八道要好得多”。随着美国加紧向非洲扩张，新老殖民主义强盗们的这种“摩擦”和吵架，将不可避免地会更加频繁起来。

非洲在美帝国主义者的心目中，是一个势在必夺的殖民主义的重要障地。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在向非洲扩张时，可以完全不顾它的西欧盟国而行事。西欧老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他们决不肯轻易放弃他们的利益。美帝国主义虽然有独霸非洲的野心，但为了镇压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仍然不得不借助于它的盟国。例如，美国原想完全挤掉比利时在刚果的势力，独吞刚果，但是，刚果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刚果的尖锐矛盾，却使美帝国主义不



得不放慢独吞刚果的步骤，暂时缓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便共同镇压刚果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美、比等帝国主义通过刚果各叛乱集团所举行的“圆桌会议”，“决定”共同瓜分刚果，就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非洲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但要遇到老殖民主义者的垂死挣扎，而且还面临着美国新殖民主义者这样凶恶和狡猾的敌人。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十分艰巨、曲折的。帝国主义虽然在刚果和非洲其他某些国家中可以找到为它们效劳的傀儡，如同在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中那样，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在日益觉醒的广大非洲人民面前，是无法用假仁假义掩盖起来的。美帝国主义充当国际宪兵的角色，到处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不断从反面教育着各国人民，也教育着非洲人民。美帝国主义对刚果的侵略，特别深刻地教育了非洲人民。在卢蒙巴等被杀害以后，从非洲东部的内罗毕、桑给巴尔到非洲西海岸的科纳克里、阿克拉，从非洲北端的拉巴特、开罗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到处都掀起了抗议美、比帝国主义血腥罪行的群众示威怒潮。马里首都巴马科群众大会的决议写道：“担任着国际帝国主义宪兵角色的美帝国主义，继反对古巴，反对老撾以及支持法国反对战斗的阿尔及利亚等行动之后，又一次在非洲各国人民眼前暴露了它的不守信义和罪恶的惯

技，证明了它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这次使整个非洲沉入哀痛的祸首。”几内亚新闻社在评论肯尼迪政府对刚果问题的立场时指出：肯尼迪政府的“假面具已经断然撕下来了”，这个政府的“立场是清楚的：这就是积极支持刚果人民的侵略者和它们的可耻代理人哈马舍尔德。”“非洲不会对殖民主义重新占领刚果一事袖手旁观。任何威胁都阻挡不了坚决进行反帝斗争的非洲各国人民摆脱来自任何方面的统治和维护他们来之不易的独立。”担负着贩卖“友谊”的使命到非洲去的威廉斯，在桑给巴尔就遇到了要他滚蛋的示威群众。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领袖阿里·莫辛在群众大会上表示：“威廉斯说美国支持非洲独立斗争，但我们很清楚他对‘非洲独立’的理解。我们将使他了解，我们反对间接的新殖民主义就像一贯反对直接的殖民主义那样强烈。”最近在开罗举行的全非人民大会，谴责了以美国为首的新老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侵略。大会还特别通过了关于新殖民主义的决议，决议指出，“新殖民主义是威胁新近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或者接近这种地位的国家最大危险”，决议号召非洲人民加强动员，“遏止新殖民主义和清除帝国主义最后的老根”。

不管是老殖民主义也罢，新殖民主义也罢，都镇压不住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挽救不了殖民主义在非洲必然灭亡的命运。美帝国主义玩弄种种阴谋手法，到头来只能是枉费心机。



論形式邏輯的對象和作用*

王 忍 之

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研究什麼，它的作用範圍是什麼，在目前我國邏輯學界、哲學界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見。

形式邏輯所研究的問題，相對於思維內容來說，乃是形式方面的問題，它研究概念、判斷、推理的形式，揭示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形式邏輯要求人們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時，所使用的概念前後含義一貫，進行推理時，前提和結論不自相矛盾，等等。學習並掌握了形式邏輯這門科學，我們就能判定思維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就能保證我們的思維具有正確的形式結構，就能夠把思維內容確定地、不矛盾地、有條有理地組織起來和表達出來。

有些同志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在實際上否認形式邏輯的研究對象是思維的形式結構，認為形式邏輯應當研究具體的思維內容，應當能判明具體的思維內容是否和客觀實際相符合。他們以為，形式邏輯教給我們的知識，應當足以用來駁倒一切具有錯誤內容的思想觀點。持有這種意見的同志認為，形式邏輯如果不研究具體的思維內容，起不了他們所說的那種作用，那它就不成其為科學了，就沒有必要去研究它了。他們把形式邏

輯看成是一門具有階級性的科學。由於現在的形式邏輯沒有能滿足他們所提出的種種要求，他們就主張按照他們的意見來“修正”或“改造”形式邏輯。這些同志以為，他們的意見反對了唯心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邏輯理論。這些同志還以為，他們的意見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的形式和內容不能分割、形式和內容相統一的原則作根據的。

這篇文章想來分析一下這種意見，看一看它對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的看法是不是正確；看一看它所主張的對形式邏輯的“修正”或“改造”會引導出什麼樣的結果；看一看它所根據的原則究竟是什麼，是不是辯證唯物主義關於內容和形式之間關係的觀點；看一看它所反對的究竟是不是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的邏輯理論，而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的邏輯理論在形式邏輯的對象和作用問題上的錯誤究竟在哪裡。

目前，我國邏輯學界、哲學界對於形式邏輯的對象和作用的不同意見，在推理這個

* 關於形式邏輯的對象和作用，在我國學術界有各種不同意見。本刊發表這篇文章是為了提供大家討論——編輯部



範圍里，表現得特別集中和明顯。所以，本文對上述問題的討論也着重於這一方面。

任何事物，它的內容和形式總是結合在一起的。沒有無內容的形式，也沒有無形式的內容。思維也是如此。人們的思維總是有了一定的具體內容，總是以一定的形式構造起來。思維形式並不是同思維內容無關的獨立自存的東西。但是，這種情形並不妨礙一種以思維形式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的存在，形式邏輯就是這樣的科學。

形式邏輯能夠這樣做的原因何在呢？任何統一物的各個方面、各個屬性總是互相聯系的，它們不可分離地結合在一起。但是，統一物中的各個方面、各個屬性又是互相區別、各有特點、相對地獨立的。思維的兩個對立的方面——思維內容和思維形式的關係也是如此。這種客觀情況，就使我們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在認識事物的一定階段上，撇開統一物（在這里，就是思維）中的某些方面或屬性，只把另一些方面或屬性抽取出來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恩格斯寫道：“思維不僅在於把相互聯系的原素綜合成為統一體，而且也以同樣程度來把認識的對象分解成為各個原素。沒有分析就沒有綜合。”^①對統一物進行分解，抽取其中的某一部分、方面、特性、環節來進行研究，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常常是必要的。各種具體科學都是以統一物中的某方面、某屬性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形式邏輯把思維的一個方面——思維形式抽

取出來進行研究，並不出乎常情，並不值得驚奇。

在這點上，形式邏輯同數學是相類似的。事物的質和量總是結合在一起，正如同思維的內容和思維的形式總是結合在一起一樣。人們把事物的量的關係抽取出來進行研究就有了數學，把思維形式抽取出來進行研究就有了形式邏輯。恩格斯在談到對數學的研究時寫道：“為要能夠在其純粹狀態中去研究這些形式和關係，那麼就必須完全使它們脫離其內容，把內容放置一邊作為不相干的東西；這樣我們就得到沒有面積的點，沒有厚度和寬度的綫， a 和 b ， x 和 y ，常數和變數”^②。恩格斯的這段話也適用於形式邏輯：為要在純粹狀態中研究思維形式及其關係，那就要暫時使它們脫離其具體內容，把內容放置在一邊作為不相干的東西，這樣我們才能認識思維形式的種種類型，認識它們的本質、規律。

對於大量的思維材料（它們既有內容，也有形式），形式邏輯不去研究它的具體內容怎樣，是正確還是錯誤，是反映了哪一個階級的思想，等等，而是把思維形式抽取出來進行研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形式邏輯是暫時撇開了具體的思維內容來研究思維形式的。經過這樣的 research，從具體思維材料中總結出了關於思維形式的規律之後，就可以用這種知識來為一定的思維內容服務。由此可見，形式邏輯雖然不研究具體的思維內容，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頁。

② 同上書，第38頁。



只研究思維形式，但是研究形式的目的，却不是為了形式。探究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對於我們說來，其所以是有意義的，就因為這種研究有助於我們有條理地、循序漸進地思考，有助於我們的思維活動達到正確的（符合於客觀實際的）結果；就因為這種研究使我們能夠以恰當的形式來表述和論證正確的（符合於客觀實際的）思維內容。

一般說來，形式是由內容決定的，而形式對於內容又起一定的反作用；一定的內容要求一定的形式，但有時內容又會表現在同它不相適合的形式中。內容在什麼程度上決定形式，形式和內容發生怎樣的不一致和矛盾，這是要根據具體事物作具體分析的，不能一概而論。如果只抱著內容決定形式，有什麼內容就一定有什麼形式的公式，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正確的思維在內容上是正確的，在形式上也是正確的*。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是以大量的正確的思維為依據而得到的。思維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歸根結底，決定於它是否適合於正確的思維內容的要求。但是，事實上，大體上是正確的內容被表達得缺乏條理、曖昧不清的情形是存在的。在這種情形下，正確的內容就由於形式結構上的缺點而遭到了損害。另一方面，錯誤的思維內容被表達得條條有理、前後一貫的情形也是存在的。當然，在這種情形下，錯誤的思維內容不會由於形式上的“完滿”而成為正確；相反，它愈是前後一貫，就愈會暴露出它的錯誤，所以它為了掩飾錯誤，又往往發生邏輯

混亂。這些情況，一方面表明思維內容對於思維形式起着決定作用，思維內容和思維形式之間具有統一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思維形式對於思維內容有一種相對獨立性，思維形式和思維內容之間存在着矛盾。我們之所以能夠把思維形式抽取出來研究，其根據就在於此。

思維內容和思維形式的矛盾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錯誤的思維內容具有正確的思維形式。現在有些同志竭力否認這種矛盾。金岳霖同志在《論真實性與正確性的統一》一文中說：內容（指推理的前提、結論的內容）錯了，推理形式也就錯了。李世繁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認為，一個推理，只要其前提的內容錯誤，那它的形式結構就必然是不正確的。李世繁同志說：一個推理形式是否正確，是隨推理的前提、結論的內容而改變的，如果不這樣看，那就是用形式脫離內容的觀點來觀察問題。總之，照這些同志看來，思維內容和思維形式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思維形式對於思維內容的相對獨立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根據這種觀點，這些同志進而認為，撇開了具體思維內容來研究思維形式，來論說思維形式，是不正確的。他們所說的不能撇開思維內容來研究思維形式的意思是這樣的：以推理形式為例，他們以為，要判定一個推理形式是不是正確，乃至於它算不算推

* 許多討論邏輯問題的文章，把“真實”和“正確”當做兩個不同的概念，分別用在思維內容和思維形式方面。本文不採取這種說法。



理形式,单对推理形式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看这个推理形式和怎样的内容相结合。根据这个原则,金岳霖同志认为:同样的一个推理形式,当它和无产阶级的思想内容相结合的时候,它才是推理形式,当它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内容相结合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推理形式了。李世繁同志则认为,同样的一个推理形式,当它和正确的内容相结合的时候它是正确的,当它和错误的内容相结合的时候它就变为不正确了。这样一来,思维内容就势必被拖入到形式逻辑的研究范围之内,势必要以对思维内容的研究来代替对思维形式的研究,而具有不同内容的思想在形式结构上的共同点,却因此就被抹杀了。同样的一个思维形式既然一会儿是思维形式,一会儿又不是,一会儿正确,一会儿又不正确,那末,思维形式本身就没有什么规律性可言了,对思维形式的研究就无法进行了。

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有人进行这样的推理: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上应天象的,岳飞是个英雄人物,所以岳飞是上界星宿下凡。当然,这种想法是十分荒谬的,但我们应当说,其错误是在对英雄人物、对自然现象等等的看法上,而不是在思维的形式结构上。从那样荒谬的大前提中,自然引导出荒谬的结论来。在这里,推理形式倒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按照金岳霖同志的看法,就不是这样了。他在《论“所以”》这篇文章中说:“所以”即推理形式“相对于科学”,“基本上有阶级性。”所谓推理形式“相对于科学”的意思是:某一推理形式的发生或作出

以及它之是否正确取决于科学水平。所谓推理形式“基本上有阶级性”的意思是:推理形式“基本上”是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的。金岳霖同志的立论根据是:“形式如何,主要地是由内容决定的。内容有某些一般的或基本的特点,形式也有该一般的或基本的特点。”^①固然,人们提出某种内容的推理是同一个时代的科学水平有关的,往往是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的,但是,难道据此就可以断定推理形式“相对于科学”、“基本上有阶级性”了吗?

就拿对英雄人物的看法来说吧。我们现在说,凡是英雄人物都是适应于一个时代的社会要求而产生的,岳飞是个英雄人物,所以岳飞是适应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要求而产生的。我们的这个推理,和上面举的那个推理当然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科学水平,具有不同的阶级性。但是两个推理所用的形式是同样的。取决于当时科学水平的,具有阶级性的,是具体的思维内容,而不是那个“所以”(即推理形式)。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由此可见,有些同志的文章虽然也承认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思维形式,但是按照他们否认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的矛盾的观点,人们就不可能去研究思维形式的特点、本质和规律。按照他们的观点,人们只要去分析思维内容的特点,去研究具体的思维内容是否正确就行了;人们只要把这种分析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用来论

^① 《论“所以”》,《哲学研究》1960年第1期,第36页。



說思維形式，就叫研究了思維形式了，就算是正确地說明了思維形式了。其實，對思維形式的研究如果被對思維內容的研究所代替，思維形式就得不到正確的說明，形式邏輯這門科學也就不能成立了。

金岳霖同志說，形式邏輯的研究對象不能和不当是撇開了具體思維內容的思維形式，但同時他又承認，在研究形式邏輯過程中，要“讓思維形式暫時脫離它的具體內容”。他以判斷為例寫道：“研究的目的是要正確地反映判斷這一思維形式，是要得到科學的抽象，是要得到關於判斷這一思維形式的正確概念”。而在這個概念中，金岳霖同志說，思維形式是暫時地和它的具體內容脫離的^①。當金岳霖同志這樣說的時候，他是說出了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的特點。但是很明顯的，既然要使形式暫時地和內容相脫離，然後才能得到關於思維形式的概念，那就應該承認，作為形式邏輯的研究對象的正是暫時撇開具體思維內容的思維形式。

二

形式邏輯這門科學能起怎樣的用，在哪个方面起作用，取決於它的研究對象是什麼。這是很明白的。一門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在什麼範圍內，這門科學就能有助於人們解決在這個範圍內的問題。對於形式邏輯的研究對象採取了不正確的看法，那末，對於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的作用的看法也就勢必錯誤。

對於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的作用，有些同

志的看法是：形式邏輯不僅能夠管推理在形式上是否正確，並且還“管得到”推理在內容上是否正確（指推理的前提、結論的內容是否和客觀實際相符合）。宰木同志寫道：“說形式邏輯只管推理在形式上是否正確，不管它在內容上是否真實，就是要使邏輯研究離開了實際去做‘純’形式的研究，不能不說它是一種迷信觀點，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學術觀點。任何形式都是一定內容的形式，離開了內容就沒有什麼形式可言，因而離開了真實，也就沒有什麼正確可言。如果形式邏輯真的管不到推理的是否真實，那我們還有什麼必要再去研究它呢？”^②有的同志說：主張形式邏輯只管思維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而“管不到”思維內容是否正確，最終要把形式邏輯導向唯心主義與形式主義。

有些同志，如周谷城同志認為，在一個具體推理中，前提內容是否正確，這是要靠實踐來檢查的，形式邏輯不研究、也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這本來是一個很平易的看法。但宰木同志因為主張形式邏輯要管並且“管得到”思維內容（推理內容）是否正確，所以反對上述這種看法。宰木同志是這樣批駁的：“試問哪一種科學研究可以把實踐剔除在外？……誰曾說過形式邏輯的推論可以不注意實踐工夫呢？那末，有沒有人不注意實踐工夫而在‘純理論’地研究形式邏輯呢？有。那就是資產

① 《論“所以”》，《哲學研究》1960年第1期，第34頁。

② 《邏輯研究同樣要聯繫實際》。見《邏輯問題討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7頁。



階級的各式各样的邏輯实证主义者。”^① 宰木同志的这个反駁，把許多同志所主張的形式邏輯“管得到”推理內容是否正确的含义显示出来了，这就是：形式邏輯負有依据實踐来判明推理前提是否正确的使命，似乎只有形式邏輯中包括了依据實踐来檢证前提是否正确这样的內容，才叫做不把“實踐剔除在形式邏輯研究之外”；只有对形式邏輯持有这样的观点，才叫做不是“純理論”地研究形式邏輯。在宰木同志发表这种观点的同时，馬特同志也在自己的文章中說：邏輯理論中的唯心主义者主張推理前提真实不真实不是形式邏輯所要探究的問題^②。

的确，研究形式邏輯是离不开實踐的。列宁說过：“人的实践活动必須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識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邏輯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③ 而人們認識邏輯的格、認識思維形式及其規律又是离不开在實踐基础上产生的思維材料的，只有对这些材料进行抽象概括，才能得到关于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知識。并且，人們对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認識是否正确，归根到底是要靠實踐来檢驗的。可是，研究形式邏輯离不开實踐是一回事；形式邏輯這門科学本身的內容包括不包括依据實踐来一一檢证推理的各个前提是否正确，这又是一回事。宰木同志把这两回事混同起来了，他用研究形式邏輯离不开實踐作理由来批駁周谷城同志的意見，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只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下形式邏輯這門科学的实际，我們就会看到，形式

邏輯這門科学中并没有依据實踐来驗證前提是否正确这样的內容。从形式邏輯中，我們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关于某个具体的推理所依据的前提的內容是否正确的回答。这是明显的事实，是否认不了的。那末，是不是可以把这种状况看作是形式邏輯的局限，应当加以“克服”呢？是不是可以把这种形式邏輯看作是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邏輯理論指导下的形式邏輯，从而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它进行“改造”呢？有些同志就是这样主張的。但正如周谷城等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办不到的。人类的思維具有无限复杂的內容，在一个个具体推理中所依据的前提的內容千差万別，形式邏輯根本没有能力一一研究它們，判定其正确和錯誤。而且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它們已經或正在被各門科学研究着，各門科学依据實踐来回答它們是正确的还是錯誤的。这样的工作，毋須形式邏輯去管。如果說，形式邏輯不具体研究各个推理前提的內容，不能解决它們是正确还是錯誤这样的問題，是一种局限，那末，类似这样的局限，各門科学都是存在的。化学不研究也解决不了历史学所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历史学不研究也解决不了数学所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如此等等，而其他各門科学也都不研究、都解

- ① 《邏輯研究同样要联系实际》。見《邏輯問題討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0頁。
- ② 《馬克思主义的邏輯理論，还是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邏輯理論》。見《邏輯問題討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5頁。
- ③ 《哲学筆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3頁。



决不了形式邏輯所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各門科學都有的這種局限，來源於各科學部門之間的合理分工，是不能夠和不應當加以“改造”的。硬要“改造”形式邏輯，使它不再具有這樣的局限，那就勢必把各門科學一一包括到形式邏輯里面來，使之成爲一種萬能的、駕手一切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這當然是不正確的。

更多的同志對於形式邏輯“管得到”思維內容是否正確的說法，採取了另一種解釋，即形式邏輯“要求”推理前提的內容必須是正確的。馬特同志後來也採取了這樣的解釋。顯然，僅僅要求前提內容正確，還很難說得上“管得到”推理內容是否正確。自古以來，人們在進行推理時，總是自以爲是要求前提“正確”，而且自以爲是從“正確”前提出發的，但是事實上，人們對正確的標準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而且許多推理所依據的前提其實是錯誤的。

形式邏輯是“管”推理在形式上是否正確的。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第一，形式邏輯研究各種推理形式，指出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不正確的；第二，形式邏輯指明何以某些推理形式是正確的，某些推理形式是不正確的，即它告訴我們判明推理形式正確與否的規律規則。現在，有些同志說，形式邏輯“管得到”推理在內容上是否正確。這句話實際上不外乎下面兩種意思：第一，以爲形式邏輯應當研究各種推理的具體內容，也就是研究各個前提和結論的內容，指明其正確或不正確。但這是辦不到的，前面已經說過了。第

二，以爲形式邏輯能夠指明何以某些內容應當被認爲是正確的，而某些內容應當被認爲是不正確的，也就是形式邏輯能夠指出知識的真理性的標準是什麼，為什麼應當是這個標準而不是別的標準。可是，這是哲學認識論所研究和解決的問題，不是形式邏輯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硬要形式邏輯解決這樣的問題，那就勢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到形式邏輯中去，這當然也是不正確的。

從形式邏輯不具體研究思維內容是否正確，單靠形式邏輯的知識還不能判明思維內容是否正確這個意義上來說，形式邏輯是“管不到”思維內容是否正確的。既然如此，形式邏輯是不是就與尋求知識和驗證知識的真理性的無關了，就不值得再去研究它了？決不是這樣。前面已經說過，研究形式的目的還是爲了內容，這里不妨再進一步說明一下。

形式邏輯研究了思維形式，依靠了它的幫助，我們能夠檢查思維形式正確與否，這樣，形式邏輯也就能夠幫助我們去探求知識、去驗證知識的真理性的。具體說來，在判明前提正確的條件下，遵循了形式邏輯的規律規則進行推理，那我們就能夠獲得包含某種新知識的結論（周谷城同志認爲，通過演繹推理不能獲得任何新知識，這個看法是很難令人同意的。宰木同志在文章中批評了這個觀點，這是正確的）。在前提內容業已判明爲正確的條件下，依據形式邏輯的知識，檢查了推理的形式結構，判明了它是正確的，那我們就能確定推理的結論是正確的。反過來，推理的結論業已判明是錯誤的，而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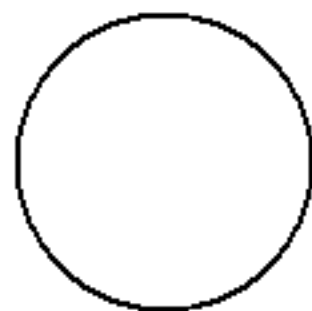


形式邏輯的知識，檢查了推理的形式結構，判明了它是正確的，我們就能夠確定推理前提中至少有一個前提是錯誤的，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我們看到，形式邏輯雖然不能單獨判定思維內容是否正確，但它對於人們尋求知識、驗證知識的真理性來說，却有着自己的作用，這種作用是其他科學所不能代替的。在所有這些場合，我們也看到，形式邏輯所以能起這種作用，並不是因為它研究了具體的思維內容，而恰巧是因為它只研究思維的形式結構，是因為它提供了判明思維形式結構正確與否的知識。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形式邏輯能夠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在一定限度內，在判明思維內容是否正確方面起作用，不承認這種作用是不對的。但我們必須具體分析形式邏輯在什麼條件下、在何種程度上、通過什麼途徑來起這種作用，而不能向它要求它所做不到的事情。

當然，在全面地評價一個個思想的時候，不只要看它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尤其要看它的內容是否正確。仍以推理為例，我們要評斷推理所達到的結論是否正確，就既要看看推理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還必須看推理的前提在內容上是否正確。我們不能說，一個推理的形式結構正確了，這個結論就是正確的；我們也不能說，這個推理的前提在內容上是正確的，這個推理就是正確的。必須二者兼備，才能說這個推理是正確的推理，它所達到的結論是正確的結論。我們所要求的是，推理的前提、結論的內容正確和推理的形式結構正確的統一。

一方面，在評價一個個推理的時候，應當採取形式和內容相統一的觀點；另一方面，形式邏輯又沒有能力單獨判定推理的前提、結論的內容是否正確，只能用來判定推理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而且承認，一個推理雖然其前提、結論的內容錯誤，但是只要其形式結構正確，這個推理就是合乎形式邏輯的。有些同志不這樣看。他們認為，既然我們要求的是內容正確和形式正確的統一，那末，一個推理，其前提、結論的內容錯了，就沒有什麼形式正確可言，這個推理就應當被看作是不合形式邏輯的，如果還認為它合乎形式邏輯，那末這種形式邏輯就沒有用了，就不再是科學了，就是“形式主義的”邏輯了，就應當被“改造”。這個看法是不對的。

所謂內容錯誤就沒有什麼形式正確可言的說法，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拿推理來說，為了達到錯誤的結論，牽強附會地進行推論，破壞了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則的情形固然是很多的，但確也有這樣的情形：前提、結論的內容錯誤了，其形式結構卻是正確的，也就是說，這種推理是從內容錯誤的前提合乎邏輯地引伸出了一個內容錯誤的結論。還可以拿文章來作一個比喻，固然有很多內容很壞、文理也不通順的文章，但確也有內容貧乏、錯誤而文理通順的文章。既然有這樣的事實，辯證唯物主義就不能加以否認。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形式和內容的統一是有條件的、相對的，其中包含着矛盾，同樣的內容可以具有不同的乃至相反的形式，而同樣的形式也可以附着於不同的乃至相反的內容上。辯證唯物主義



承认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这种矛盾，并且正因为看到了这种矛盾，才认为我们在看待事物，例如看待文章、推理的时候，必须采取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观点，不能只看内容，不看形式，或者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如果凡是内容贫乏、错误的文章就一定文理不通，凡是前提、结论内容错误的推理其形式结构就一定不正确，等等，那末，在评价文章、推理等等的时候，就只要看它们的内容、或者只要看它们的形式就行了。这样一来，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要求对我们也就没有意义了。

指出形式和内容的区别和矛盾是有实际意义的。这种实际意义就在于使我们可以如实地评价那些内容和形式有矛盾的事物，就在于提醒我们，对于错误的东西，要具体地分析其错误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从而根据不同的情况，用相应的武器来批判它。对于文理通顺但内容贫乏、错误的文章，用语法这门科学所教给我们的知识去批判，那是白费力气。对于内容错误、形式结构正确的思想，要想用形式逻辑去批判倒它，那也是徒然的。要批判这样的思想，必须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依据有关科学的研究成果，依据事实。内容错误的思想，常常会犯逻辑错误，这时形式逻辑就能够而且应当在批判这种错误思想时起作用。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单靠形式逻辑，或主要靠形式逻辑，也是驳不倒错误思想的。列宁说：“单靠论据和三段论法是不足以驳倒唯心主义的。”^① 现在有些同志以为内容错误的思想，形式也就一定错误，以为单靠形式逻辑，或主

要依靠形式逻辑，就能批判一切错误思想，并将其驳倒。他们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不利于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

指出形式和内容的区别和矛盾的另一个重要的实际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为好的内容取得一个同它相适合的形式，是要经过一番努力的。如果内容正确的文章，天然就是文理通顺的，那末，文章家就不必用气力去学习如何遣字造句行文，而语法学、修辞学也都可以废除了。如果一幅画的思想内容好，天然就会具有很好的形式，那末，画家就不必用气力去学习用笔、构图、透视等等了，而素描学、透视学都可以废除了。但是，事实上，文章家和画家总是要为熟练地掌握这些属于技巧和形式方面的本领而花很大的气力，虽然他们永远不可能仅仅依靠这方面的本领而成为大文章家和画家。只是卖弄技巧和形式，那是形式主义者。但是如果为了怕成为形式主义者而不在技巧和形式方面下功夫，不能熟练地掌握这方面的本领，那也永远达不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很明显的，我们不能因为语法这门科学只能用来检查文章的遣字造句合不合式，无力判明文章内容的好坏，就说语法没有用，不是科学，就说这种语法是“形式主义的”语法。我们更不能因为，我们要求于一篇文章的不仅是文理通顺，尤其要内容充实正确，就认为必须把现在的语法科学加以“改造”，让它来研究什么叫文章的内容好，什么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叫文章的内容坏，让它来教导人們判明文章内容的好坏。同样的道理，全面评价一个思想的时候，既要看它的内容是否正确，也要看它的形式是否正确，但决不能据此就说，用来检查思维形式是否正确形式逻辑就没有用，就不是科学，就应当加以“改造”，要它来研究思维的具体内容，使它单独地判明思维内容是否正确。现在有些同志，对于形式逻辑原来能够起的作用——检查思维形式结构是否正确——极端轻视，说形式逻辑如果只能起这种作用，形式逻辑就等于没有用；他们要求形式逻辑起更大的作用——研究思维的具体内容，判明它是否正确，这却又是形式逻辑所无力胜任的。这样一来，形式逻辑岂不是就进退两难，无路可走了吗！

三

可以看出，有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混淆了。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只有内容没有形式的思维，或者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思维。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没有。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可以从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的统一体中，把思维形式抽取出来作为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用这种研究的成果来检查思维形式是否正确，并通过这个途径来对探求、表述、论证正确的思维内容起作用。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可以的。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来代替、偷换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虽然有某些差异，但是在实际上却都是以下述的方式

来立论的：“形式和内容是不能分割的，有内容就有形式，有形式就有内容”，“任何形式都是一定内容的形式，离开了内容就没有什么形式可言”，等等；据此，他们就說，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不应当只是思维形式，不应当不探讨推理前提的内容是否正确，不应当管不了思维内容是否正确。这就是說，他们都错误地以为，既然对第一个问题应该作否定的回答，对第二个问题不用多說也应该作否定的回答了。

所以有这种混淆，是因为他们对思维是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两者的统一的了解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在统一的东西中，看不见它的不同方面、不同属性所具有的差别。在统一的地方，他们只看见统一，看不见统一中所包含的矛盾；在互相联结的地方，他们看不见在联结成一个整体时各个不同方面、属性所仍然存在的相对的独立。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承认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是有分别的，但是，在实际上却否认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之间的区别和矛盾。

这种形而上学的了解使他们以为，只要主张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科学，是用来检查思维形式结构是否正确的，那就是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事情难道真是这样吗？

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逻辑理论在形式逻辑研究对象问题上的错误，并不在于它们认为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而在于它们对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观点，对于如何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观点，是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



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邏輯理論或者认为思維形式及其規律是先驗的，或者认为它們是人們为了自己的需要和方便而臆造出来的。

康德所持的观点是先驗論。他說：“邏輯应当包含的仅仅是先驗的規律”^①。他又說：邏輯“仅論究先天的原理”^②。和康德一样，牟宗三說：邏輯就是“理性自身的形式方面的发展或推演”^③；又說：“理性自身就是不关論外界的那普遍的形式的人类理性。……邏輯的推演完全是先天的，不依靠經驗的。”^④

另一些唯心主义者，采取另一种观点。例如邏輯实证主义者卡尔納普认为，說邏輯規律是对于“真正的邏輯”（即客观邏輯）的忠实表达，乃是一种虛妄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見解。他以为邏輯規律就像玩紙牌的規則一样是人們随心所欲地規定的。照卡尔納普的說法，“邏輯就是語法。”他写道：“对于語言底形式，我們在每一方面都有完全的自由；不論构造句子的規則和变形規則（后者通常被称为‘基准’和‘推論規則’），都可以十分任意地选择。”^⑤和这种观点相类似，張东蓀认为：“同一律是思想上的律而不是事实上的律。于此所謂思想却是指‘說話’而言。倘使采取唯物的見地，以为思想是事实的映印，那就不相謀了。在此所謂思想完全是說人类用符号（即言語）所表示的东西。这些符号是人造的，不是事实的映印。符号与符号之間具有內在的規則。这种內在的規則就是所謂邏輯。于是我們便可卑之无甚高論，而知道这种思想律只是說話的規則罢了，不必有

客观的对应，亦不是宇宙的理性。”^⑥

各种唯心主义的邏輯理論，虽然有那样那样的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們都否认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客观性。这种理論之所以被称作是形式主义，是因为它們都把思維形式看作是和思維內容完全无关的东西。它們以为，先驗的、或人所臆造出来的思維形式，是人們外加于思維內容之上，以使用来整理思想的內容，整理經驗，整理事物的。

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邏輯理論既然把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看作是和思維內容、和客观世界完全无关的东西，于是这种理論就认为，对于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研究，无須从实际存在的并受实践檢驗的思維材料出发。既然认为思維形式及其規律是先驗的，康德就說：“邏輯既不能从任何科学中获得原則，也不能从任何經驗中获得原則。”^⑦而牟宗三就說：研究形式邏輯“首先在認識邏輯本性而指定那理性自身”；就說：“几个前提一确定，就可以推出全部的邏輯世界。”^⑧既然认为思

① 轉引自《邏輯問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頁。

② 《純粹理性批判》，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1頁。

③ 《邏輯与辯证邏輯》。見《唯物辯证法論战》（这是由張东蓀主編的一本反对唯物辯证法的論文集），民友书局1934年版，第77頁。

④ 同上书，第93頁。

⑤ 轉引自康福斯著：《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59、161頁。

⑥ 《唯物辯证法之总檢討》。見《唯物辯证法論战》，民友书局1934年版，第187頁。

⑦ 轉引自《邏輯問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頁。

⑧ 《邏輯与辯证邏輯》。見《唯物辯证法論战》，民友书局1934年版，第92—93頁。



維形式及其規律是人們臆造出來的，卡爾納普就認為，研究形式邏輯就是去給“基本的邏輯符號”指定某種意義，就是“自由地”去創造某種公式或符號的系統。

在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的邏輯理論看來，思維形式正確與否，是指它和先天的原理是否相符，或者能否在自己創造的系統內說得過去，不相矛盾，根本和反映客觀實際的思維內容無關，根本用不着去找它們的客觀的對應（即根據），因為這種東西是不可知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存在。這種割裂思維形式和思維內容、割裂思維形式和客觀存在之間關係的觀點，當然是錯誤的。用這種觀點來研究思維形式及其規律，完全對形式邏輯的曲解。

和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的邏輯理論相反，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思維形式及其規律雖然和物質世界不同，它們只存在於人們的思維過程中，但是，人們的思維所以有這樣的形態，而不是別樣的形態，所以必須遵守這樣的規律，而不是別樣的規律，却不是先驗地確定了的，也不是人們可以隨意選擇的，它們具有客觀性。也就是說，思維形式歸根到底是客觀事物的反映，思維形式的規律也是有自己的客觀根據的。列寧曾經指出：“邏輯形式和邏輯規律不是空洞的外殼，而是客觀世界的反映。”^①他又說：“最普通的邏輯的‘格’……是事物的被描繪得很幼稚的——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最普通的关系。”^②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思維形式對於思維內容不是“外在的”東西，不是人們為了某種目的

將其附加到思維內容上去的東西，而是思維內容本身的形態，是思維內容的各個組成部分的連結構造的方式。

從上述觀點出發，對於如何研究思維形式及其規律，就得出和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的邏輯理論完全相反的結論。第一，思維形式既然是思維內容本身的形態，因此就應當研究大量的豐富的思維材料，主要是研究其內容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思維材料，考察其中的思維內容是以怎樣的方式構造起來的（注意：仍舊不是研究這個或那個思維內容是否正確、是否符合客觀實際之類的問題）。只有進行了這樣的 research，在大量的思維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抽象概括，我們才能獲得思維的形式結構的種種類型及其相互關係的知識。當思維形式隨着思維內容的發展、豐富而發展、豐富起來的時候，這樣的 research 就能夠擴大和加深我們對於思維形式的知識，把形式邏輯科學推向前進。第二，思維形式既然是思維內容本身的形態，所以思維形式結構正確與否，就是看它對思維內容起着何種作用而定（注意：不是隨着具體的思維內容是否正確而定）。某種思維形式結構是正確的，這是說它能夠把思維內容確定地、不矛盾地、有條有理地組織起來和表達出來。就推理而言，運用正確的推理形式，在前提內容正確的條件下，就能保證我們得到正確的結論。某種思維形式結構是不正確的，

① 《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頁。

② 同上書，第189頁。



这就是說它对于思維內容不能起上述的作用。在實踐中，經過了长期的、反復了亿万次的檢驗，人們看到了某些思維形式結構起着上述的好的作用，某些思維形式結構則不然。在这样的基础上，人們才能制訂出关于各种思維形式結構是正确或不正确的理論来。离开了思維形式对思維內容起着怎样的作用的問題，思維形式就談不上正确或錯誤。第三，某种思維形式結構所以能起这种作用，而另一种思維形式却起另一种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們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关系。因此，要正确地說明某种思維形式結構何以正确或何以錯誤，要說明其中的規律，就不能不研究思維形式結構及其規律的客观根据。

在形式邏輯研究对象問題上，辯證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觀點就是这样地对立的。这两种观点之間的对立不在于一个主張形式邏輯既要研究思維形式，又要研究思維內容，一个主張形式邏輯只研究思維形式。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邏輯理論必須批判。可是，如果不切实地具体地去分析唯心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的观点何以是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那末，我們就不可能把矛头指向真正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我們的剖击就会不中腠理。有些同志在看到康德、邏輯实证主义者們主張形式邏輯只研究思維形式，就說誰主張形式邏輯只研究思維形式，那他的观点就是从康德、从邏輯实证主义者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些同志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邏輯理論，就起来反

对形式邏輯是研究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科学，这就正像我們所常說的，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澡盆里的孩子也潑了出去。

在形式邏輯的作用問題上，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邏輯理論的錯誤，也并不在于它們认为形式邏輯的作用是檢查思維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确，而在于它們或者把这种作用看得一文不值，或者竭力夸大这种作用的意义。康德既然把形式邏輯所研究的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看作是和思維內容、和客观世界无关的东西，因此他就认为，形式邏輯虽然能够提供判断思維形式結構是否正确的标准，但是它对于人們寻求知識、验证知識的眞理性來說是毫无意义的。邏輯实证主义者則认为，眞理的标准无非是命題和命題、思想和思想間的一致，不相矛盾。邏輯实证主义者紐拉特写道：“句子要和句子来比較，不是和‘經驗’，不是和一个‘世界’，也不是和任何別的东西。……每一个新的句子都要碰到一种由許多現成的并且已被弄成一致的句子所构成的总体。所以一个句子如果能被放在这个系統里面，它才被称为正确的。凡我們不能使之入于系統的，就須作为不正确而予以擯棄。”^①这就是說，一个思想只要其形式結構正确，其內部沒有自相矛盾之处，它就是眞理。这样一来，原来是在檢查思維形式結構方面起作用的形式邏輯，就被看作是眞理的最高、唯一的評判者。

我們只要肯定了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客

^① 轉引自康福斯著：《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89頁。



观性，肯定了思维形式乃是思维内容本身的形式，我们就和康德完全相反，认为形式逻辑所提供的检查思维形式是否正确的标准，对于人们寻求知识、验证知识的真理性来说是有用的。我们只要肯定了一个思想之是否正确不仅要看其形式是否正确，而且主要地是要看其内容是否和客观实际相符合，我们就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完全相反，认为用来检查思维形式结构是否正确等形式逻辑，并不是什么万能的科学的科学。现在有些同志认为，形式逻辑如果只对检查思维形式结构起作用，那它就不配当科学研究的工具，形式逻辑就没有用，这时他们的观点恰巧和康德是一致的。当他们在反对这种“无用的”形式逻辑时，他们企图改造它，使它成为知识的真理性的全能的评判者，这却是某种唯心主义、形式主义，例如逻辑实证主义所能够赞同的。这些同志没有能正确地反对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逻辑理论，就因为他们的观点不符合形式逻辑这门科学的实际，就因为他们所根据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而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长期以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理论支配着形式逻辑这门科学，它们歪曲了形式逻辑的本来面目。在旧的形式逻辑的著作和教科书中，不但对这门科学的理论解释还存在着很多错误，就是在介绍形式逻辑这门科学本身的内容方面，也存在着烦琐、脱离实际等毛病。这些都是必须批判和纠正的。但是我们应当做的，是要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加在形式逻辑科学身上的种种歪曲，而

不是要从研究对象和作用范围等方面去“修正”或“改造”形式逻辑这门科学。可是，现在有些同志却要改变形式逻辑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要扩大这门科学的作用，要改变这门科学的性质。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这样做结果，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逻辑理论对于形式逻辑科学的本来面目所作的歪曲，并不能得到纠正，反而会又一次地歪曲形式逻辑的本来面目；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逻辑理论并不能被驳倒，反而会取消了形式逻辑这门科学。

辩证唯物主义为形式逻辑科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形式逻辑科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我们就能批判和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逻辑理论，就能对形式逻辑科学及其规律规则作正确的理论说明，还它一个本来面目。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形式逻辑这门科学的实际状况出发，掌握丰富的材料，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就必定能取得新的有价值的成果，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相反，如果不从形式逻辑科学的实际情况出发，任意摘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语句，使之简单化、片面化，以这作根据，对形式逻辑提出种种要求，并企图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些内容搬到形式逻辑科学中去，把它们作为形式逻辑科学的内容，那是不正确的，也是没有益处的。

